

內 容 提 要

这是退休老工人白宝纯的家史。

白宝纯是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到处流浪,出卖劳动力,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他在旧社会經受了四十年苦难,做过学徒、童工、碼頭工人,要过飯,卖过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騙到国外当过华工,日本侵略者統治东北期間被騙当过劳工,后在北京拉过多年的洋車,又在門头沟作过煤矿工人。他亲身經受了凶残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封建軍閥、反动政府、资本家以及把头、特务、警察等的欺压凌辱,亲眼看見了旧社会的腐朽堕落,肮脏黑暗的生活,同时也目击“三·一八”“一二·九”等反帝爱国民主运动。四十年中,他颠沛流离,寻求出路,終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見天日,过着幸福的晚年。他的这部家史,恰好是二十世紀上半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縮影,也勾勒出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具体面貌。这部血泪斑斑的家史对万恶的剝削阶級、压迫阶級,对黑暗的旧社会作了有力的控訴。

目 次

- 第 一 回 穷孩子讀書成夢想 小徒工學藝受煎熬 3
- 第 二 回 長心胸 離家謀生 受欺騙 出國當華工 14
- 第 三 回 暹羅火 老白毛 丟丑 運軍火 小華工 歷險 21
- 第 四 回 返租國 受辱 牛馬 走江西 飽當 差 罪 苦 31
- 第 五 回 愛國革命 青年 洒熱血 鬧革 命 烈士 拋頭顱 38
- 第 六 回 國民黨 害人民 鬼子兵 處事 欺人 同胞 42

- 第七回 卖鲜血穷人难还债48
 举大旗学生要抗日
- 第八回 当劳工受尽人間苦54
 爭自由逃出虎狼窝
- 第九回 落陷阱挖煤彈春矿61
 入牢籠苦睡薄板棚
- 第十回 美国佬援助国民党69
 弟兄伙围困救济署
- 第十一回 寻活路再次下煤窑78
 埋死者几番爭棺材
- 第十二回 泄仇恨痛打恶把头85
 講团结大毆包工柜
- 第十三回 庆解放翻身作主人91
 干革命永世不忘本

第 一 回 穷孩子讀書成梦想 小徒工学艺受煎熬

国有国史，家有家史，人都有自个儿的历史。我如今六十多岁了，在旧社会要过饭，当过学徒，做过苦力，在国外当了三年华工，拉过近二十年的洋车，给日本侵略者抓了八年劳工，末了到门头沟下了煤窑。凭着一身气力，推、拉、扛、挑，什么都干过，走南闯北挣口吃的，可就多咱也奔不出个好日子过。要不是来了共产党、解放军，我一辈子也熬不出头啊。眼下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有好些事不懂得。我得从头说说我这一辈子的事，好叫年轻人明白明白。

我家祖上是旧时直隶(河北)正定府人。听老人说，有一年滹沱河发大水，我家逃荒来到北京。爷爷和爸爸都是瓦匠，他们拣些破砖烂瓦，在前门外后河沿的河滩上垒了间矮房子，这就成了我的老家。

公元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强盗^①进北京，爷爷正在前门外后河沿五眼井给义和团的人打水，洋鬼子一枪把他打死了。奶奶赶去收尸，洋鬼子又一枪打残了她的左胳膊。

全家的担子落到爸爸一人身上。那时，他已经娶了我妈，

得了我姊姊。洋鬼子进来那陣，西太后^②急急忙忙溜到西安。听老人說，北京都給鬼子搶空了，鋪子燒的燒了，倒的倒了，偌大的京城象一片大坟地，大白天狐狸在街上走。待西太后回来，旁的事她全不在意，头一件就是大修頤和园。当瓦匠的爸爸也給招了去，全家总算混上口飯，那时家里又有了我和妹妹。我小名就叫二宝。

赶西太后修完頤和园，石工瓦匠都遣散回家。那时有多少建設？有几家用得着瓦匠？北京地面上掙不出吃來，我們家越混越不好过。张家口有家大买卖家來北京找人打洋井，我爸爸有这份手艺，跟人說妥了要去。回家一商議，犯了

① 八国联軍。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利用中国政府的腐敗无能，加紧掠夺中国，企图瓜分中国。当时激起中国人民的憤怒，中国农民自发地組織起义和团等反侵略的組織，英勇地抗击帝国主义。一九〇〇年，德、日、俄、法、英、美、奧、意八国，借口清政府“排外”，联合进攻中国。清朝慈禧太后一方面不抵抗，往大同逃跑；一方面派人向八国联軍求和。当时，八国联軍攻陷北京后，又往张家口、正定、山海关、吉林、沈阳出兵，但这些军队都遭到义和团的抗击，陷于包围中。它們这才被迫承認中国不可瓜分，同意和清政府議和。所謂議和，却是簽訂了一个奴役中国的《辛丑条約》，勒索中国賠償各国軍費銀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还清，本息折合九亿八千多万两；强要中国允許各国駐兵北京、天津和山海关；將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館界”，清政府保證禁止国内人民反帝国主义的活动；惩办“祸首”和賠償“損失”等等。

② 西太后，就是慈禧太后，是清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光緒两朝的皇权統治者。她掌握大权后，就采用“借洋兵剿逆”的政策，依靠外国侵略者的支援和汉族地主武装力量，鎮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各地人民的武装起义。她对外投降，对内残杀人民。生活上奢侈腐化，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她为了自己享受，移用了建設海軍的經費八千多万两銀子，修建頤和园；八国联軍搶劫后，她从西安回来，不管国家的困难和民生的雕敝，又下令修复頤和园。

愁；家口不帶吧，叫三個孩子跟着我媽和奶奶怎么活？帶吧，一家六口去了也養不活。爸爸狠了狠心，把我姊姊送給人家當童養媳，老奶奶留在北京要着吃，帶着媽媽、我和妹妹上了張家口。

打井打了半年多，這當兒，我們一家人還住着小店，等打完井結算，按來時議的價，那買賣家還該着打井的錢。誰知人家喝上了甜水，橫挑鼻子豎挑眼，硬說井打得不好，賴了賬。爸爸氣得去告他們，哪告得上？“衙門口兒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我們家生活頓時沒了着落，回北京又沒路費。小店住不起了，張家口風大雪大，爸爸找了個燒過磚的破窑洞，拾些草鋪個地鋪，搽些干牛屎駱駝糞籠個火，一家四口算有了個窩。我爸對我媽說：

“二寶娘，你領着孩子去要口吃的，我去尋零活做。”

“多寒儉！”

“我就不懂得寒儉？我不是沒手藝，也沒偷過閑耍過懶，可自個兒還顧不上，上哪兒給你們弄吃的？”

這以後，我媽一手牽着我，一手抱着妹妹，沿門挨戶去要飯。那時張家口有錢人的住宅，大門套着小門，大門里圈着牲口，二門里才住人。要飯的在大門外要，喊破嗓子里面也聽不見；到二門要去吧，家家養着狗。我從小害怕狗啊，見着狗就圍着媽的腿肚子轉，媽邊央告人邊護着我，可我还是躲不了，腳跟上給咬得血淋淋的，如今還留着傷疤。

天冷沒有燒的，媽叫我去搽駱駝糞，她和妹妹去要飯。有

天我拣粪回来，见我媽搂着妹妹躺着。破窑黑黢黢的，我只当我媽睡着了呢，我就在窑洞口玩。我爸回来了，进了窑。我只听得他喊我媽：“起来，吃块餅子。”“怎么啦，好几天沒吃的，好不容易买了甜餅子，你还不吃？”“怎么睡得这么死，推也推不醒。”过一会儿，爸爸出来了，鎖着眉，問我：“二宝，你媽什么时候死的？”

我一楞：“不知道。”

我爸一声不吭，进窑蹲着，两手支着头，只見他眼泪鼻涕往地下淌，不見一点响动，我和妹妹吓呆了。半天，我爸才哭出声来，我們父子仨哭成了一团。

我們家是回族，人死了不用棺材，得請阿訇^①来“出卖抬”（主葬），把死人洗干净以后用白布纏上。这时候我家哪有白布？我爸上礼拜寺去請阿訇，怎么央告，沒錢人家不来。沒法儿，幸好张家口荒地多，我爸拾些柴禾烧化了地，借把鑿刨开冻土，招呼我：

“二宝，你媽养你一場，你来抱着她头，咱爷儿俩抬了去埋了吧。”

“你可要記住，你媽要了吃的尽顧着你們，她自个連餓帶病，悄默声儿就死了。”

我使劲抬着我媽的头，我媽身上还是那件破得不能挡风的棉袄，就这样下了土。

我爸带着两个孩子干活去，人都嫌。好容易挨到开春，暖

^① 阿訇，就是伊斯兰教清真寺里負責管理宗教事务的人。

和点儿，沒錢坐車，我爸就挑了两个破筐，前面放破烂家什，后面放我妹妹，領着我沿路要飯賣力气，走回了北京。

我爸在北京找不出活路，和奶奶商議：守在家里困死，不如去闖碼頭；闖好了，兴許能捎个錢回来。这麼的，我爸就走了，留下一个老的两个小的在河滩混。

自打各国使館占了交民巷，这河滩就成了交民巷的垃圾堆。各国使館和兵营的脏土、爐灰、泔水，都往河滩倒。成天价尘飞土揚，蠅子結队狗成群，一陣臭、一陣酸的味儿，一搭湿、一搭干的地儿。我們家的破房子正好在这河滩上。可这垃圾堆，倒成了穷人的宝地。一帮帮象我这么大的穷小子，赤着脚、背个筐在河滩来回轉。烟头、廢紙、煤核、破瓶、烂鉄、大粪，見什么拣什么，动不动为了爭一个破罐头盒打架。那时街上沒有个公共厕所，拉尿的人找个方便的地方就蹲下。瞅着有人蹲下了，几个孩子在边上守着搶那堆粪，还得防着狗来夺食。我就挤在这一大群孩子里头搶点破烂賣錢。我奶奶守着护城河的豁口，給过路人平砖填土，要几个小錢。

能掙几个錢的活，我都干。十岁的小子，滿城鑽去，今儿上御河桥帮着推一把車，明儿上火車站給人搬行李拿包袱。再不然就提个罐子，拿上碗，赶車口吆喝賣热茶去。赶上大戶人家办紅白事，就去打执事，給新姑娘举彩仗，給丧家背大鼓。白事講究打鬼，远道的一走几十里地，一次打到城外，黑了，关了城門。管事的把借給我們的衣服一收，我們几个孩子就在城外冻一宵。冬天的晚上，我又頂着冷风，去金魚池拉冰，給冰窖厂送去。这麼东鑽西奔，好了一天掙十来个子，刚够吃

的；掙不着的時候，還得提着破籃，吃飯的工夫，到四鄰街坊門前一站：“大伯，大娘，今幾個沒掙着吃的，您行行好，多少給一點。”

“這小子又來了，拿去，快走！”掰下一口吃的扔給我。十歲的孩子，也懂得要臉呀，忍氣接下東西，再往別處央求去。心里想：等我長大了就好啦，長大了掙的多了，也不要老奶奶去要小錢了。

可眼下我還沒長大，靠我們一老一小要來的，養不活妹妹。我那小妹妹，長得好模好樣的，人見了都夸。奶奶也挺疼她，可沒法子，等她長到八歲的那年，也給人做了童養媳。女婿，是個歪嘴搭拉腦袋的傻子。

家里就我一個孩子了。奶奶疼我，總覺得我這麼要飯搽破爛的，不是個常法，怕誤了我一輩子。她寧可自個去要小錢，省吃儉用攢幾個子兒，也要我好歹念幾天書。那時前門外有個德老先生在鐵柱宮開着學堂，我去了。一進門我先給“孔聖人”的木牌牌磕了磕頭。站起身來，那老先生從頭到腳瞟了我一眼，問：“你念過書？”

“沒有。”

“父親干什么的？”

“瓦匠。”

“爺爺干什么的？”

“瓦匠。”

老先生不知哪來的氣，滿臉不高興：“哼！三代不濟，出身下賤，穿着這一身破爛，配念書？”把我攆了出來。

我还是在河滩上混。河滩有个大牛圈，是广安門里牛街馬家的产业。馬家养着这群牛，供交民巷外国人喝奶。他家在牛街还开着“奶茶馬”食品店和醋坊。那馬家老太爷来回在河滩走，见我长得浑实，能干些活，就对我奶奶說：

“这小子挺可爱，我挺喜欢他，不如叫他上我那儿去当学徒，也好学門手艺。”

我奶奶一听，連忙說好話：

“您恩典。您这是栽培他。您行好积德。”乐得她見人就称道那馬老太爷的善心。千叮万囑叫我用心学手艺。学成了手艺，就有了活路，也有了脸儿。

我也是一心想学好呀，这回再不用低三下四地去求大爷告大娘了。哪知道那馬老太爷一不叫上醋坊，二不叫上食品店，把我就囚在他家里伺候他。大清早，我起来就給他端去洗脸水，又端茶端飯，刷痰盂洗尿壺，擦桌子扫地，忙完屋里的事情，还得搖煤球，背黄土，一天不得闲。最犯愁的还是晚半晌馬老太爷回来，他往躺椅上一歪，我就得赶紧跪在一边，不歇手地給他捶腿捶腰。这一捶就沒了时辰，直捶得我胳膊抬不起来，可不敢緩一緩手。他晚上上床，还讓我跪在床边給他捶。我人小发困，一打瞌睡，他出手就揪我耳朵，磕我脑門：“吃饱了犯迷盹，叫你睡！”他有一个弯脖拐棍，晚間就挂床边。我捶着捶着，見他半晌不动弹，只道他睡熟了，这才提起脚儿悄默声儿往后退。刚退沒几步，他就拿起拐棍勾住我的脖子：“你跑，你跑哪儿？”勾着脖子拉我到床面前，还得挨頓揍。直到他睡得死尸似的，我才到門房歇下。

这还不算，沒事就拿我逗乐。他們家少爷从学堂里回来，馬老太爷这老賊就招呼他們：“来来，看我給你們按个酸鼻猴！”冷不防就伸出大拇指紧按我的鼻子。按得我眼睛发辣，泪水直冒，哭出声来，他們家少爷笑开了，这才放手。还罵我：“哄着玩呢，还哭！真是給臉不要臉。”

一天晚上，我送回他的尿壺，他皺起眉問我：“这尿壺涮淨了？”我說涮淨了，还用开水燙过。

“燙过？这臊味儿，你聞聞，你聞聞。”說着就使劲把着我的头往壺嘴上按去。我人小也有个小脾气，你是人我也是人，我干嗎去聞你的尿臊臭！我提起尿壺使劲往地下摔去，喀啷一声，尿壺碎了，我撒腿就跑回家了。

当了十来个月的使喚小子，一个子的工錢也沒拿着。可一声也不敢吭，倒觉得自己惹了事，一見馬老太爷在河滩上走，赶紧轉过脸去，躲得远远的。

好歹得讓我学点什么，将来有个指望呀！我奶奶又千求万托，讓人荐我当学徒。后來說妥了讓我上前門外珠市口“滿三群”包子鋪去。临走，奶奶抹着眼泪：“哪怕有条破褥子給你捎上也好，就这光身一人打发你走了。”又囑咐我：

“这回你可不能跑回来，我按下手印，滿师前跑了人还得貼回飯錢。”

这鋪子里除了掌柜的和手艺人外就我一个学徒。重活、杂活都在我一人身上，从早起三四点到晚半夜，生火、扫地、提水、打飯、涮案子、倒泔水……全是我的事儿。光說每天那两桶泔水，就难死了我。当时街上又沒有下水道，百十来斤重

的担子，得挑着走出老远，倒在隔着好几条胡同的脏水沟里。我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哪挑得动，夏凉天还好挨，冬天又沒鞋，脚上的口子有孩子嘴那么大，两桶泔水压在身上，一步一撑，口子上鮮血直冒，痛得鑽心。半道歇一歇，掌柜的老远望見，提了擀面杖，背着手，側着身子过来，劈头劈脑地打。那脚上的口子一直留到現在。現在矿上設了澡堂，天天热水燙脚，可还长不上，那时候遭的罪就难說了。

长年累月地缺觉，困得熬不住，清早上現炸着麻花，站在油鍋边就打盹儿。掌柜的一見，搶过油筷子，蘸上鍋里的油往我脖子上烙，滾热的油比火还燙呀，烙得我滿脖子起泡，到如今还留着疙瘩。

光脊梁穿件空心棉袄，领子撑得那燙烂了的脖子生痛，我索性撕了去。冷风往棉袄里直灌。一身土一身汗，晚上沒有鋪的盖的，还穿着睡觉。白天黑夜脫不下来，衣服縫里长滿了虱子。好几回央告掌柜的給几个小錢去洗回澡，掌柜的就是不理。白天吆喝包子，身上发痒，隔着衣服挠一挠，掌柜伸手就擰我的腮帮子，說我“現眼丢人”：“你尽掏掏，人見了恶心，誰还吃我的包子？”

受这么大的罪，我可不敢逃。“私走逃亡”，叫我奶奶怎么出得起那飯錢？我在那儿熬了有二年多。

有一天夜里，袁世凱耍花招，要他部下鬧兵变^①，忽拉一下搶了前門大街。天剛明，猛听得街上乒乓的枪响，鋪子也沒敢开张。等枪声靜了半晌，掌柜的才叫我去探消息。我打开一块鋪板一探头，可了不得：街上滾着人头，那砍了脑袋的，



也不是什么当兵的，就是老百姓。老娘們抱着孩子哭天抹泪儿的滿处認脑袋。掌柜的发了慌，歇了几天天矣。我也乘这兵荒馬乱的时候回了家。

奶奶見我人給糟害得不象样子，手艺却沒学成，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掉。我到底年幼，虽說沒学着手艺，也还没凉了心，总想着等我长大了能找出活路来。

① 袁世凱(1859-1916)，北洋軍閥的首領，是个可耻的反人民的大独裁者、窃国大盜。在政治上他一貫投机，耍两面派。辛亥革命时，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威胁孙中山先生讓位，一面挟制清帝退位，从而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临时政府，已决定建都南京。为了取消帝制，南北統一，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邀請袁世凱去南京就職，并派出迎袁专使到北京。袁世凱以本身利害关系，坚持建都北京。他表面愿意往南京，暗中却指使他統轄的曹錕部队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夜間举行暴动，在东安門及前門一带放火搶劫，全城枪声四起，通宵达旦。帝国主义国家駐北京的外交使节也配合行动，决定調遣军队到北京护卫。这一幕活剧的目的，在于說明他非“坐鎮”北方不可，于是建都南京之說遂作罢論。

第二回 长心胸离家謀生計 受欺騙出国当华工

爸爸在外地呆了几年，回家来了。人問他那几年去哪儿了，他說在天津碼頭卸貨輸去了。那时，英帝国主义侵占了天津作商埠，大輪船装着洋貨，源源地运来中国，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又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替他們作苦工。所以爸爸說：“天津碼頭用人多，穷人好混。”虽說穷人好混，可也只顧了一张嘴，回来时还是两手空空。

我閑在家里，就跟爸爸学瓦匠。可我們父子俩攬不上活，甯說盖房子的少，就是請人搭爐灶盘炕的也不多。做三天歇五日、做十天歇半月的，家里常揭不开鍋。我爸爸眼面前只我一个小子，哪有不疼的？可生活逼得他成天豎眉瞪眼的，对我也沒个好声气。

“长这么大还不能自己掙着吃，你不能长点心胸？”

我十三四岁，正长个儿，吃的多，遇上我爸发愁，劈手夺下我手里的窝头：

“还吃，你倒不怕撑着？能吃，长点心胸掙錢吃館子去。”

奶奶見爸爸生气，也在一边叨叨：

“是啊，二宝，你长大可要长心胸，好好干活，养活你奶奶

和你爸爸。”說着又把爸爸奪去的窩頭掰一塊給我。

臘月二十六，我爸給我十六個子兒，叫我去買一斤半面，預備着吃頓熱湯面。我提了個小面口袋，在面鋪門前呆了半晌。心里着實翻騰哪，這斤半面買回去，到時候不夠吃，又得挨爸爸的刺。不如自個兒長點心胸，拿這十六個子當路費到天津碼頭卸貨輪掙錢去。那時我小呀，不知天津多遠，想着拿十六個子吃飯，走一天就到了。早先聽爸爸比劃那外國輪船，我就猜不透怎麼鉄東西還能漂着，這回也上天津去見識見識。

我只知道天津在東邊，趂拉着兩隻破棉鞋，一直往東走去。黑了，半道上沒處住，我找個背風的上坑就眯下了。身單衣薄的，遇上這臘月寒天，差點兒凍僵。第二天走着走着，望見遠處一大片瓦房。進到街里問人：

“勞駕，大爺，這兒可是天津？”

那人嘆味一笑：“你打哪兒來的？這是通州，天津遠着呢，往東去還有二百里地。”

我頓時抓了瞎，回去吧，怕爸爸打；往前走吧，多咱能到？餓得難受，買了半斤餅子吃了。又花了錢，還能回去？

我也是十三四的半大小子了，那年我爸闖天津碼頭，不也是空着兩手走的嗎？硬着頭皮往前去吧。

一路上求了吃的求住處，又走了兩天一夜，在第三天夜里到了天津，餓着肚子在鋪子門前階上坐了一宿。一大早見幾個賣力氣的蹲着聊天，我就問：“您知什麼地方是碼頭？”

“找碼頭麼事？”

“卸貨輪去。”

那些人大笑起来：“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往东一指说：“那儿就是码头，你去看看，寒冬腊月的，河里上冰，哪来的货轮？”我一听，三脚两步赶到河边，真封着冻，哪儿还有船！我发了楞，眼眶里满是泪珠子，早知不该来，这可怎么办？

穷孩子要长心胸，可真不易。满心想靠自个儿的力气挣饭吃，偏又落到了要饭吃的地步。我跟一群和我差不离大的“小花子”混熟了，抱着个破罐子，围着饭摊转，来一个吃饭的要一个。晚上找个避风的屋檐下，大伙挤到一堆睡。冷得十分不行，就抓个小狗搂在怀里躺下。睡着睡着，警察来了，猛咕叮的几脚把我们踢醒。一睁眼，我们就跳起脚来四处逃奔。

好容易海河开了冻，我心想有盼头了。可是天津码头上苦力多呀，都卸货轮。那些洋线、纸张等杂货，每包二百多斤，不让小孩扛。只好在码头上拉小车，一趟发一块竹牌，一块竹牌只有几个小钱。一天拉下来，不够吃，还得去乞讨。十四五岁的孩子，离乡背井的，这苦处和谁说呢。

那是一九一六年，听人说，英国人招人到外国挖金矿。心想着外洋的钱好挣，挣了钱好养活奶奶和爸爸，就去登上了记。登记的人可不少，都想找条活路呀。好几万人给送到威海卫去验身体。我验完身体出屋子，一个管事的冲着我喊：“大喜，验上你了，六千零三十三号。”接着订合同，合同上写的什么，我一个字都不认得，就听管事的说：“出国做工，三年为期。”让我按了指印，还问我的姓名。我说：“姓白，小名叫二宝。”

“‘二宝’不行，我替你取个大号，叫白宝纯吧。”

我滿心快活，連这个名字都覺得新鮮。

一上了船，就象当头泼了一桶凉水，我心里的一点盼望、一点快乐，頓時浇灭了。

大海輪分三层艙，上层中层挺寬敞，也講究，可不是給我們住的地方。几千个华工，都給塞到統艙里，不許随便出来。低矮的艙房，上下架了七层鋪位。說是鋪位，其实是一排排紧挨着的木头格子。每格高不过二尺，长不滿五尺，坐着直不起腰，躺下得蜷着腿。又悶又热，憋得人张着大嘴喘气。船一开，木架子一晃，就象搖煤球一样，把人晃得直吐，吐得艙板上下不去脚。汗臭再加呕吐的腥味，熏得人全动弹不了。这分明是鸡鴨籠子、大牲口圈，哪把我們当人？

船到日本神戶，已經死了二十多个人。有的半道扔海里了。有的死了好几天还沒有人知道，直到船在神戶停下添煤，帶領我們的外国人捂着鼻子来查艙房，才发现。船一停，只見輪船边一溜装煤小舢板，舢板上穿得破破烂烂的妇女和孩子排成趟，用蒲包往上递煤，两旁有人拿着棍子守着。成群的孩子伸手向船上的外国人要錢，外国人故意把錢扔到海里，这些孩子就不要命地往海里跳，扎猛子捞上几个子儿来。我寻思，在中国看到的日本人都那么神气，敢情他們老百姓也一样受穷？！

船到美国旧金山就靠了岸。下了船，住在鉄皮盖的屋子里，来了几个英国兵教我們下兵操，我們直納悶：挖金矿干嗎下操？一連操了一个多月，又給英国兵押上輪船，从旧金山坐船到紐約，又从紐約坐火車，往加拿大开去。車窗是釘死的，

車廂两头有英国兵站崗，不許我們走动。沿路站上，华侨举着“欢迎祖国同胞”的三角旗欢迎我們，英国兵也不讓他們走近。是怎么回事？湖蘆里卖的什么药呢？我們想法偷偷弄开窗户，几个华侨扔进来几盒紙烟。打开烟，奇怪，錫紙里的白紙上写着字。递给識字的念来，原来是：“同胞們，留神！欧洲正在打仗，外国人招你們不是为挖金矿，是要你們替他們打仗。”

真好比一陣悶雷打在头上，我們都傻了。有哭出声的，有抱着头发悶的，有打开窗子逃跑給抓回来的，大伙都罵那些英国招工的是騙子。罵是罵，那时我們可沒有組織，拿不出办法来。我們哪知道，那回打仗就是狗咬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搶夺殖民地，正在进行火拚。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和英、法、俄等国組成的“協約国”大打出手。他們逼着本国老百姓打仗还不够，又卑劣地串通我国反动的北洋軍閥政府，用黄金、英镑賄賂我国的官僚买办，誘騙大批华工出国去給他們当炮灰。我們懊恼自己上了当，但是已經飄洋过海到了外国，路上又有英国兵押着，也只好走着瞧了。

下了火車，从加拿大坐船到英国，又轉运到法国。一群英国兵押着我們，先在卡勒，后来又在布伦、馬賽这些港口当軍工。我們住在帐篷里，四面围着鉄絲网，不讓我們跟法国老百姓来往。听說这里不光有我們中国人，还有印度人、越南人、埃及人、黑人，……那时候，印度和埃及是英国的殖民地，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老百姓成了亡国奴，都是被抓来当炮灰的。最惨的还是黑人，帝国主义者对他們动不动拳打脚踢，打死几个不当回事。

我們的情況比黑人也好不了多少。黑天白日，英国兵拿着鞭子，看着我們卸炮弹、挖战壕、修路……。一次卸船，一箱子弹压在肩膀上，我人給压得趴地下，嘴啃着地，正迷糊着，腰眼里还給穿着大皮鞋的英国兵踢了一脚。挨打受累不算，說不定哪天还把命送了；碼头上吊貨的大絞車尽出事，一次，吊鈎松了，一个木箱掉进船艙，顿时毒气四散，滿艙的浓烟，把里面的人都熏倒了。我正好也在艙里，給熏得暈了过去。醒来，只見眼前黑黝黝的，身边躺着些印度人，原来是給扔进了病号帐篷。

躺了好几天，沒有人来送吃的，也沒有人来治病。我想我这回要是死了，奶奶和爸爸连我死在哪儿都不知道。躺着躺着，眼泪直往外冒。突然一个念头：我不能逃走嗎？逃不回祖国，也逃出这个兵营，逃开前綫，逃出这个正打仗的地方呀！可眼前怎么办呢？病着餓着，怎么逃得出去？

幸好同来的伙伴替我着急，悄悄地把我的运了回去。这我才知道，出事的那天，英国人法国人有紅十字会的救护车送他們上医院去，我們呢，扔下就不管了。

过一陣子，德国飞机在离我們不远的地方扔炸弹，炸死了四队的几百个华工（我是在十队）。我一听这个消息，又气又怕。干嗎还在这儿等死？我成天捉摸着怎么逃出去。一天，德国飞机又来炸，我乘着乱劲躲过站崗的英国兵，跳上一輛貨車。管它上哪儿呢，先出了这个虎口再說。車到布伦停下了，我混进了布伦市里。

我們当軍工的时候，一天給三頓飯吃，定量，不給菜也不

給油，难得給一片咸肉。每天給一个法郎的工資。我不知道一法郎值多少，一下火車，覺得肚子餓了，想在小攤上买点吃的东西。那时候正打仗，法国通貨膨脹，法郎不頂用，我随便吃了一頓，就花了十几个法郎。真够噲呀！原来我們十几天的工資，才够吃一頓飯。我原先还当是外洋的錢好掙呢。

那么些日子积下来的法郎，几頓飯就花完了。肚子又餓，又怕給警察抓回去，城市里不敢呆，我跑到农村里去打零工，給法国妇女干些零活，找些吃的。法国老百姓待我不錯，就是也太穷。几个土豆就算一頓飯，剩不下吃的給我。我在北京看到的法国人，一个个西装笔挺，皮鞋格格的响；在法国，老百姓虽然也趿拉着一双皮鞋，可是有的只剩个尖头，鞋帮都沒有了。

在农村混不下去，我又跑回車站。車站两边站滿了法国老人小孩，火車一过来，他們就伸手要錢要吃的。車上有时候扔下些吃过的罐頭来，罐頭底里还剩点儿肉末、油水，一大群法国孩子围上去搶。一回，我也跟着去搶，誰知給法国警察一眼瞅見，过来一把揪住我，铐上了手铐，又把我送回了华工大队。

第三回 逞淫威老白毛丢丑 运軍火小华工历险

我帶着手铐回到了卡勒。英国工头一瞅見我给押解回来，冲我脸上就是一巴掌，嘴里还嘍哩咕嚕地罵着。当时翻譯不在，不知他罵了些什么。反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我给打得差点栽了个跟头，嘴巴啣嚙了一声，回罵了一句，那家伙又一拳挨得我滿嘴流血。隨即把我編入逃跑后抓回的华工队伍，說叫什么“囚犯队”，叫我把原来的衣服脫下来，在背上剪了个大圓窟窿。穿上这号阴阳怪气的囚犯衣服还不够，每个人的胳膊上还得箍上个大銅錫子，上面刻着各人的号码，自个想摘也摘不下来，就象牲口身上被烙上了印記一样，再逃就很容易被認出抓回来。

“囚犯队”的华工，陸續增加到七八十人。英国工头专給我們挖坑、修路、搬炮弹等又重又累的活干，还挖空思想出些狠毒的刑罰来折磨我們。一开初，为了給我們来个下馬威，就在每个被抓回来的华工脖子上套上个四五十斤的砂袋，工头騎着自行車在后面逼着我們跑圈。誰有自行車跑得快呢？何况我們脖子上还吊着那么重的东西。我們跑不过自行車，騎在車上的工头就揮舞着皮鞭，朝我們身上胡抽乱打。有

个姓顧的华工，跑着跑着嘴里噴出一股鮮血来，倒在地上就断了气。我人小，跑不动，干脆趴在地上不跑了。工头騎在車上用鞭子，有时倒甩不到我身上，即使沾点边，也比跑着圈圈挨打好受些。

往后我們的衣服上也用油漆写上了号碼，工头把咱們看管得更紧了。誰一天上几趟廁所，抽几趟烟，都有人記着，趟数多了，就說你磨洋工，瞎搗蛋，要叫你的号头出来受罰。这刑罰更新奇，叫什么“海水刷皮”。英国工头在海边支了个鉄架子，把他們認為“調皮搗蛋”的华工拉去剝光衣服，用鉄絲綁在架子上，在头上安个蓮蓬头，接上水管，讓海水往他身上嘩嘩的澆。英国工头在旁边拿着把刷地板的硬毛刷子，朝华工身上嚓嚓乱刷。刷得人皮开肉綻，鮮血淋漓。海水是咸的，渗进伤口，痛得人渾身直打乱顫，媽呀娘的直叫喊。

在帝国主义者的眼里，中国人不如他們的一条狗。他們的狗还能吃上牛肉，喝上牛奶。可我們这些华工每天干上十五六小时的活，吃的尽是洋白菜头、黑面包干，又冷又硬，实在难咽下去。华工逃跑被抓回来的越来越多，我們的“囚犯队”漸漸人多势大，自称“好汉队”，有时候实在忍无可忍了，也敢跟英国工头干一家伙。我曾亲眼瞅見个叫謝宝贵的华工，他越过柵栏逃走时給英国监工抓住了，他返身从怀里掏出把尖刀，捅了那监工的后脊梁一下，那家伙瓮的一声，沒叫出来就倒在地上，差点咽了气，别的英国监工赶忙把他抬走了。那个华工到底逃了出去，后来下落如何，我就知道了。

我們大家都磨洋工，不好好干活，英国工头要打也打不过

来了，我們抱成团跟他們干，他們更不敢随便打罰，就請了个管理华工的英国总头前来訓話。这人原在我国开灤煤矿当总办，手上不知沾过多少中国工人的鮮血，中国話講得呱呱叫，还有个叫华什么的中国名字。他长的滿头白发，常到各个华工大队去巡視。我們当面叫他“华大人”，背后叫他“老白毛”。有天沒船靠岸卸貨，老白毛就把咱們召集起来，围了个大圈圈坐在地上，他站在中間，驕声傲气地对大伙喊話：

“你們中国人，真是下賤坯，到外国来，不好好干活，一天到晚象鴨子似的嘎嘎嘎的胡鬧。……”

我們一听就气炸了，有个叫傅杰俊的华工，三十来岁，大高个，黑紅臉，猛咕咚地站起来，指着老白毛的鼻子說：

“老白毛，你說我們象鴨子似的，嘎嘎嘎。我問你：你們当初花言巧語騙我們出国咋說的？說的是出来开金矿，絕不出入險地，可眼下我們都干了些啥？挖战壕，搬炮弹，中毒气，吃的沒油沒菜，还不給人吃飽。一天才掙一个法郎，买个鸡蛋还要一法郎二，我們苦干一天，还不够买个鸡蛋吃的。你听清楚：再这么折磨人，我們干脆拉倒不干了，你把我們送回国去得啦！”

老白毛一听，气得臉紅筋胀的，把手一挥，大声喝道：

“好，好，你們要造反，你們不干活，我叫你們瞅瞅，我叫你們瞅瞅……”

他吹了声尖厉的口哨，馬上叫来几个英国兵，押着十几个脫光了衣服的黑人过来，强迫他們趴在地上。在他們每人身旁放了个鉄盒子，英国兵一通上电，里面就伸出根亮閃閃的鋼

絲鞭子來，象毒蛇一樣，一口一口狠狠咬在黑人弟兄身上，打得他們咿咿哇哇的慘叫，鞭子沾起身上的血肉，在空中亂濺。我們瞅着心疼，想去救他們，有心無力，都難過得低下頭來。

老白毛洋洋得意地說：“你們看看，不干活的黑鬼是個啥下場，你們不怕就來試試看！”

有個外號叫“雞骨頭”的華工，別看瘦骨嶙峋的，人倒挺硬氣。他瞅着黑人給打得那麼慘，怒火一冒三尺高，虎威威地站出來，往地上一躺，說：

“老白毛，你別他媽的‘殺雞給猴看’，盡拿機器鞭子打黑人，有種的來打爺爺試試看！你打也是個死，不打也是死，老子不願給你們白送死，受洋罪了，你打吧！”

傅杰俊領着大伙一下圍上去，一哇聲吼道：“中國人不是亡國奴，是你們訂了合同招來的，不能由着你們隨便打！”

這一下英國兵不但不敢打“雞骨頭”，連打黑人的鞭子也停了電。老白毛知道眾怒難犯，叫英國兵拖起黑人就往外走。他也跟在後面往出溜，嘴里噁哩咕嚕的，說了幾句罵人的洋話，也不知道放的什麼屁。

大伙一看老白毛夾起尾巴跑了，都高興得說：“下回他要再來調咱們，非揍他個兔崽子不可！”

我們鉄了心，開始絕食罷工，成天在地上坐着，不吃飯也不干活。兩三天後，翻譯刁慶祥帶來個英國人，六七十歲，英國話稱“尖納爾”，讓咱們叫將軍。他胸前挂着副千里眼（望遠鏡），假惺惺地對我們笑笑說：“你們不干活可不行。不干這種活，也得干別的活。”過了幾天，我們被調到西邊的碼頭去搬罐



头和饼干箱子，活是轻了一些，伙食也好了点儿。可是英国工头还是不把咱们当人看待。德国飞机来了，他们都早早躲进防空洞去了，就是不讓咱们进，华工急得往停着的火车廂下边乱鑽，給炸死的不少。有一天，我在吊車时，网兜箱子一下撞在我的大腿上，衣服撕破了不說，还拉开二三寸长的血口子。炎天火热的，他們也不給我包扎一下，給撒点黄药面就算了事。

人在外国，好比树叶离开了大树，无依无靠的，胳膊到底斗不过大腿。在西边的碼頭干了不久，战局有了变化，我們呆在一块的几个华工大队也給調开了。我們队給調到敦克尔克去。这是个城市，依着山，靠着水，已經是前綫了，不远就是德国兵的炮台。

我們在火綫上，有的挖战壕，有的运子弹，經常离敌人不过一两百米，在最前綫出生入死的卖命。英国兵倒躲在战壕里放枪，軍官和机关枪手也在后边盖好頂棚的壕塹里守着，坐立自由，不打仗时什么事也不干。英国人吃的都是黄油面包。他們把最难干最危险的差事交給了我們，給我們吃的却比窝窝头还不如。

在火綫上，英国兵逼着我背子弹箱，爬山越岭，送到最前沿的战壕去。我人小，背着百十斤重的子弹箱子，哼哧哼哧的走不快，有时甚至給了子弹箱压在地上爬不起来。这时候，翻譯刁庆祥也上了前綫，跟着咱们一样受罪。他早先在北京上洋学堂，听說招华工，就志愿报名来当翻譯；那时候他还以为外国人文明，外国什么都好，只要能上趟外国，就好比身上鍍了

一层金，往后回国也吃得开了。誰知到了前綫，战壕里沒有水，脸不能洗，头发也长得长长的。还不能生火烧飯，淨吃干粮，干粮也吃不飽。又听说德国人要从海上来登陆，大家都心慌意乱，怕得要命。这时候刁庆祥常常唉声叹气，流下眼泪，想来他是后悔来了外国吧。帝国主义有什么文明？光会哄騙人、剝削人、压迫人、打罵人、屠杀人……他这回算是亲身体会到了。

熬到一九一七年八月間，发生了一个变化：反动軍閥段祺瑞的政府宣布了中国参加“协約国”，也对德国宣了战。我們这些华工成了中国政府参战的“木錢”，变成中国政府派去帮助对德作战的軍工。可是，不管怎么变，外国人招的也好，中国政府派的也好，我們在国外照样受压迫，照样当炮灰。

有一天，在战壕里分干粮时，刁庆祥从包干粮的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新聞，兴奋地告訴大伙：“嘿，咱們有了盼头啦，俄国起革命了，把兵撤了回去，不打仗了。俄国和咱們中国連在一块，不隔海，要想逃跑回国，从俄国走，倒是条便道。”那时候，我們对列宁、斯大林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还缺乏認識，但听到俄国人不主张参加帝国主义之間的战争，把兵撤回去，大家都兴奋得动了逃跑的念头。可是，一个大麻子劝阻我們說：“甭冒险啦，万里迢迢的，你能跑回家？你們不想想，从这儿往俄国跑，中間隔着个德国，跑过去被德国人抓起来，这罪也好受不了。”我听了沒敢跑。有的人还想碰碰运气，乘着黑夜不顧一切往东跑，結果都跑进了德軍的防綫，当了俘虏。

不久，我們給調到了里昂，搬運炮筒、爛鐵。在里昂，我們見到过一个中国老太太，河北武清县人。她原是天主教的修女，早先跟着外国人一起跑到法国来的。她穿得破破烂烂，脸上黄皮寡瘦，憔悴得了不得，見着我們就哭，象見了亲人似的，哀求咱們日后带她一道回国。

这时候，英国工头对咱們管束不是那样紧了，有机会我就溜号到街上去瞧熱鬧。那陣子工資早不按时发了，我手边也沒几个子儿，在鋪子里随便一問，洋葱头是半法郎一个，綫袜子是五六法郎一双，我只好干瞪眼，一样也买不起。大街上还有一种双层电車，是我在国内不曾見过的。我瞅着新鮮，想进去坐坐，法国人还不讓。一个越南人想上車，售票員蹦的就是一脚，把他踢老远，他痛得捂着肚子蹲了半天，才爬起来走了。

有一天，我正在里昂街上溜躑，忽然瞅見一群群青年男女，又唱又跳，大笑大嚷，象有什么大喜从天而降似的。一打听，才知道是德国投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了。我們在法国三年，就打了两年多的仗。战争一結束，我們华工都欢天喜地到駱耶耳去集中，等候上船回国。

駱耶耳有个华工医院，我們一到駱耶耳，不少缺胳膊少腿的华工都从医院跑出来欢迎我們。有的同乡相遇，抱头痛哭。不少人还向我們控訴了一个姓江的汉奸。他曾給英国工头出坏主意，設水牢来残害华工，害死了好些同胞弟兄。我們听了气极了，大伙馬上跑进那个鬼气阴森的石砌水牢去，救出了几个奄奄一息的华工，他們怀里抱着根烂木头，飘在水面上。我跟着一批人，由华工伤員領着，找到了那个姓江的，几石头就

把他的脑袋砸得稀烂，这就是汉奸孬种的可耻下场！

听说英国所招的十万华工当中，在法国至少死了四五千人。他们大部分都是被德国人的飞机炸死，炮弹打死，或者因为伤病死在华工医院的。也有一部分人是直接受英国工头的虐待、毒打致死的。豁耶耳就有个几亩地的华工公墓，我们回国前去吊祭过一次。只见十字架象高粱秆似的，密密麻麻地竖着，一眼望不到头。每个十字架下埋着个华工，很多十字架上连姓名也没有，只记着死者铜鐏子上的号码。再看看活着的，也有不少人瞎了眼，缺了手，少了腿，成了残废。我们看到这般光景，一个个都伤心掉泪，窝了一肚子火。什么时候才能解开这心头恨哪！

我们刚要动身回国，又听到一个叫人险些儿气炸了肺的消息。中国对德宣过战，有成千上万的华工把鲜血洒在法国战场上，也算是个“胜利国”。不久，这些胜利国派代表在巴黎开会^①，名义上是讨论和平条约问题，实际却是帝国主义之间坐地分赃。这些帝国主义的代 表觉得中国的北洋政府软弱可欺，不但不给中国半点好处，反倒叫中国把早先由德国占领的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举行了会议，称为巴黎和会，参加的有美、英、法、意、日、比、中国等二十七个国家（苏联没参加）。会议名义上是为了建立战后和平，防止新战争的威胁，实际上被美、英、法帝国主义所操纵，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分赃和策划反苏反对各国革命运动的会议。中国这次是以战胜国资格参加会议的，但帝国主义为了利用日本反苏，反而决定将战前德国在我山东的特权交给日本继承。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抗辩，爆发了“五四”运动，迫使当时中国政府代表不敢在和约上签字。

青島割讓給日本。中國反动政府的代表在各国帝国主义面前連話都不敢多說几句。有人鼓動我們到巴黎去說理。我們东奔西跑，不但沒到巴黎，还被騙到馬賽干了六个月的活，这六个月，英国人一个子儿也不給我們，說是不在三年合同規定之內。左耽誤右耽誤，直到一九一九年夏天，我們才又象牲口一样，被遣送回国。

第四回 返祖国受尽牛馬罪 走江西飽尝伏差苦

离开祖国三年多，回来一看还是没有大变样。北京添了电灯、自来水、洋車，新鋪了坑坑洼洼的石子路，袁世凱换了段祺瑞^①，可到头来还是穷的穷，闊的闊。街上尽是叫化子；还是沒风三尺土，小雨滿街泥。

到前門外一看，自来水公司把河滩填了，我家的破房子也填沒了。打听着我家的搬到了朝阳門外，一找，还是爸爸自个儿拣破砖烂瓦垒成的一間破房子。六十多岁的爸爸，一手瓦匠活，寻不着事，只好拉洋車去。奶奶老得直不起腰，遇着好天，还拄着拐棍到前門外熟鋪子去要几个小錢。

我那时候正十八岁，也长得肩寬膀粗的，年輕力壯，可是滿处求人托門子，就找不着一份正經差事。本来穷人的門路就不多嘛。只好也跟着爸爸拉車。这一拉，就拉了十八九年。

只要有一条活路能走，就不会抄起車把干驴子的活。每天一睁眼，就象沒脑袋的蒼蠅似的到处轉，不知今天吃的是哪一方的粮。賃出一輛車来，有买卖沒买卖，一天得交三十个銅

^① 段祺瑞，袁世凱的部下，北洋軍閥皖系的首領。袁死后，皖系曾掌握北京反动政权，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子的租金，还得給車厂管車的送份礼，要不他尽給你拉不得的破車。那十八九年，我老想买一輛自己的車，哪怕破一点呢，也不用为租金担心。可就是愈拉愈穷，哪攢得起錢来？可那王煥章的車厂倒越滾越发：我初拉車那忽儿它三四輛車开的张，靠着收租金添到十几輛；以后雇了个修車的手艺匠，慢慢又添到四五十輛，就开始自己进零件，自己装配車。到解放前，前后三十年工夫，它就有了三百多輛車。真是“人挣錢，万万难；錢滾錢，不費难。”

越是穷人越挨挤。反正你无权无势，誰都可以来欺侮。拉車的誰沒受过警察的气？你的車刚一放下，他来打官腔：“洋車不准馬路盘旋”，洋車不在馬路盘旋，上哪儿盘旋去？你刚去张罗座儿，他把你車垫扔地下，一脚踩上了，怎么办？只好說下次不在这儿轉了。一次，我拉車进了东交民巷，車灯灭了，一摸口袋，忘带洋火了。跟巡捕借个火，他把二个指头一伸：一根洋火两毛錢。待要不借吧，黑了車灯就是“犯禁”，罰起来更不得了。那时候，想在交民巷拉座的洋車，得另上一道外国捐。不上外国捐的叫“外車”，只能在那儿經過，不能在那儿拉座。交民巷就是外国人的世界。

北京有了摩电車(有軌电車)以后，城里拉不上多少座儿，只得跑乡下。通州、順义县，多远的地方也得去呀。那时候沒現在这样的柏油馬路，跑好几十里的土路，高一脚低一脚，干一脚湿一脚，該吃的时候还不敢吃飽；得留着租金不算，一路上，还不知道要交多少捐呢。一回，我一过朝阳門大桥，三个銅子买一道捐，到紅庙，又一道捐，三間房，又一道捐；关关卡

卡，都要在我們这些穷卖力气的身上榨油。拉車站是好买卖，可車站你进不去，得通过搜包的（就是把头）給你找座儿，車錢得給他一半。

那时候軍閥割据，国家沒有統一，一个地方的軍閥印一个地方的票子。軍閥互相混战，今天这个軍閥被打倒了，明天那个軍閥被打倒了，街面上的票子使着使着换了样儿了，你手里的錢就成了废纸。有回我从东直門拉到热河省^①，七元錢的买卖，等我从热河拿了七元热河兴业銀行的票子回来，一买东西，鋪子里伙計說：“这票子，两礼拜前就不使了。”你找誰去？

就是找上了买卖，还有的是那些不好伺候的主儿。一个冬天里，从灯市口同福夹道貝滿女中（就是現在的女十二中那儿）走出一个穿着翻毛皮大衣的“小姐”，雇車到东四六条，講明一毛錢的价。我給她支起軟篷，拿自己的棉袄給她盖上脚。走在路上，她直跺脚催我快跑，我說：“頂风支着篷子跑不快，您在車上不知道。”她一听，說：“讨厌！”等拉她到家里，我还在外面等車錢。里面出来个听差叫了两个警察来，問我：“刚才不是你拉的車？”

“是啊。”

“跟我們走。”

“走哪儿，我还没有拿車錢呢。”

“跟我們去拿。”

我知道事儿不好，可又不敢不跟啊，一跟跟到警察署，不

^① 热河，旧省名。1955年撤銷。轄区包括現在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內蒙古自治区东南部。

审不問，关了我一个礼拜。挣不着錢不說，还欠着車厂里七天日夜两班十四份租金，車厂可不会饒人哪。这位小姐一場脾气，我两条腿得多少天才能奔出这些錢来？

拉着大兵更遭殃。大兵坐車上戏园子，下了車不給錢，装模作样說：“散戏还坐，回头一起給。”散了戏上哪儿找他？可我不敢說个“不”字。一次拉个軍官从四牌楼到通州，光脚跑了四十里地。拉到地方，他一进去就不出来了。我在兵营門口等半天沒見着影儿。跟門崗央告：

“老总，刚才那位长官还没給錢，劳您駕給找一找。”

他眼睛一瞪：

“他姓张姓李？我找誰去？”

只好自認倒霉，抄起車把往回走，心里气不过，咕嚕了几句：

“狼心狗肺，連拉車的都不放过。”

沒想到这几句話他們倒听見了，过来几个兵，围住我一陣拳打脚踢。

拉車的最怕是抓伏，可那几年軍閥混战，誰来了誰抓，躲也躲不及。我也遇上过几回，沒一回不是賠了气力毀了車，倒賠租金，还得挨打受气。有一次张学良要檢閱軍隊，他底下的小头目慌了，怕露了平常吃空額太多的餽，就把我連人帶車拉了去，白天下操，晚上住馬棚，一抓就是十多天。挺气人的要数給抓伏到江西那一回，人差点回不来，說来話就长了。

一九二二年四五月間，朝陽門外的杠房^①找人，要二百多个抬杠的，上南苑干活；說是一天給一元錢工錢，一月一开支。

我回家和爸爸一商議，好买卖誰不爭着去？这就上了南苑。誰知从南苑把我們这二百多人都赶到永定門上火車。待要不去，大兵早已押上了，“快走，苦得了你們嗎？”逼着鴨子上架，一送送到汉口；汉口又抓伏抓来民船，送到江西九江。大伙这才弄明白，是北洋政府派蔡成勛去替江西的督軍陈光远。抓我們的是蔡成勛的部下，第一师的第一旅。队伍直往南走，旅长坐着轎子，当兵的扛着枪，我們抬着炮筒、炮車轆轤。那些当兵的走着走着嫌热，把枪枝都挂在我們抬的杠子上。走的是稻田間的蚯蚓小道，担子又重路又滑，走着走着就跟斗栽到稻田里，浑身湿透，滿脸是泥，爬起来还挨当兵的大嘴巴。稍一住脚，我們都不愿意再走，給当兵的說：“老总，我們在北京拖家带口的，不能跟着你們往南走呵。”

“这是軍令，你們敢不服从？都給我跪下！”那个姓楊的旅长蛮不講理，打了我們一人一頓竹板子。有一个叫馬区元的，也是抓去的民伕，二十多岁，泼着胆子跑了，三里地外又給抓了回来，當場毙了。江西地面上也不熟，和老百姓說不通話；回来也不識道，誰还敢跑？

南方雨多。路上遇着雨，当兵的找个祠堂住下，可我們这些民伕，却一宵一宵地挨浇。我們提出要进屋子躲躲雨，他們开口閉口就說：“你們拉车的，抬杠的，在北京拉车抬杠也兴避雨？別把骨头养娇了。”你看毒不毒！遇上軍隊粮缺，飯也吃不上，大兵开飯，叫民伕自己到老百姓家找吃的。这不是叫我

① 杠房，旧社会专门經營殯葬抬杠等事的行业。它从殯葬人家收来很多錢，却付給抬杠工人极少一点報酬。

們去搶嗎？我們誰都不會搶，常挨餓。

去時發給我的一雙草鞋，早爛了，一雙腳成天泡在水里。我的腳掌腫得有半尺高，又發起瘡子來，兩天一場高燒。就這樣病着，還不准歇下，一邊冷得打哆嗦，一邊還得抬着炮車粘轆走。禍事接二連三的來，腳底下又給竹子扎了個窟窿，還得一癱一顛地抬着東西。有些民伕折了骨，也在隊伍後面爬着滾着跟着，不跟吃什麼？見着藥鋪，我趕緊向掌櫃的要點藥。人哪肯給好藥，拖着拖着，我瘡子愈發愈緊，原先是兩天一場，到後來一天兩場。隊伍在定南縣住了腳，我們在一個十里長亭里歇下了。那長亭的柱子上寫滿了送行的詩，有識字的念了出來，聽的人沒有不掉淚的。不是為那些詩寫得好，是為自己被驅得離了家鄉，受盡了罪，還不知哪一天能夠平平安安回去。我一身是病，心里想，不知還能不能見着家裡的親人，更加哭個不停。幸好近處有個溫泉，我在溫泉里洗了幾次澡，不知怎的，腳上的傷和瘡子都好了。

到了贛州，第一旅在這裡駐下，我們這些民伕用不着了。部隊派了一個姓李的旅副領着我們，說是送我們回北京去。我們走回九江，坐上貨輪到了漢口，在街上一晃就找不見那個姓李的旅副了，他把大伙的路費一吞，早已逃之夭夭，一下把我們這些人全甩下了。

漢口離北京還有兩千多里地，買車票得十好幾塊，我們身上一個子也沒有，怎麼辦呢？只好在江岸賣力氣。人人都說江南好，舊社會的江南，豺狼虎豹統治，勞動人民的光景哪里好得了！我在江西轉了這麼大個圈，到處見到的是要飯的；聽

到的是“穷了江西一省，富了武清一人”，那一人就是原来的督軍陈光远，他是河北武清县人。陈光远换了蔡成勛，也还是換湯不換药呀。我落到流浪汉口，汉口街面上还不一样挤满了叫化子和妓女。

春天离开北京，在江西来回走了六七个月。眼下已经是十一月份，身上还是一件穿烂了的单褂子，在汉口人生地不熟，躲也没处躲。没办法，只好鑽空子偷坐火車。到孝感县給查票的打了下来。走到信阳，又抓車。就这样一路上卖气力、抓車、挨打、走路，到了长辛店，才从长辛店走回家里。第二天在估衣鋪^①躲上一件棉袄，又抄起了車把子。

① 估衣鋪，旧社会专门拍卖旧衣服的店鋪。

第五回 愛國青年洒熱血 鬧革命烈士拋頭顱

那年月，軍閥混戰，炮火連天。這些軍閥各有自己的勢力範圍和後台老板，分什麼直系、奉系、皖系……互相開仗，爭權奪利，北京是必爭之地，今天這個上台，明天那個下野，上台的當大總統、大元帥、執政，下野的少不得搜刮了大批民脂民膏，倒在他們的“洋爸爸”的懷抱里，要槍炮、要彈藥，打算重整旗鼓，過幾時又打回來。所以，那時的北京就象個“走馬燈”，一個個軍閥“輪流坐庄”，你爭我搶沒完沒了，老百姓可遭了殃，誰都恨透了那些軍閥和帝國主義。

有一天，我拉車到東四九條，只見街上滿是青年學生，他們排成隊伍，手里拿着小旗，從南往北，一边走一邊舉着小旗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驅逐外國兵艦！”我想，洋鬼子盡欺侮咱中國人，是該讓他們滾蛋。聽人說，游行的群眾，剛在天安門前開罷大會，現在正在往前邊鐵獅子胡同走，目的是向段祺瑞執政府（就是現在張自忠路人民大學那兒）請願。我走前幾步想瞧個清楚，猛聽得一陣槍聲響，前面有人高聲喊叫：“執政府開槍了，打死人了，找他們講理去！”我踏起腳一看，鐵獅子胡同北牆根下躺着一個女學生，地上一灘

血。人們都氣憤得不行。忽然，槍聲又連珠兒似地響起來，鐵獅子胡同里的人都往外擁，有的咒罵，有的叫喊，只听得槍子兒到處飛，胡同口倒下了一大片人。街頭一片混亂，商店的掌櫃紛紛關門閉市，一剎時間，鬧得天翻地復。

第二天，杠房找我去拉屍體。我拉的是一个北京大學的學生，拉到騎河樓北京大學三院，身上還直淌血水。看他年紀不過二十剛出頭，他父母還不知道他死了呢。那一天，執政府門前血跡斑斑，二十多口薄皮棺材停在那兒，死的淨是青年學生，有男學生，女學生，也有十二、三歲的小學生。一批又一批家屬趕來領屍，當着那些打死他們親人的兇手，家屬們連放聲痛哭的自由都沒有。唉！軍閥們可以明目張膽地投靠帝國主義，青年們愛國反帝倒有了死罪，他們竟把一些純潔無辜的學生當成活靶打，這是什麼世道啊！那一天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後來，我才知道，這就是有名的“三一八慘案”^①，那次示威的主要領導人就是共產黨員李大釗同志。

“三一八”過了不久，奉系軍閥張作霖進了北京城。張作霖的“后台”是日本帝國主義，可是最先进城的却是他僱傭的

^① “三一八慘案”。一九二六年三月，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奉系軍閥張作霖作戰，日本帝國主義公開出面援助奉軍，以軍艦兩艘駛進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國民軍開炮還擊。於是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議，並聯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國，借口維護《辛丑條約》，以八國名義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間軍事行動和撤銷防務等。北京各界人民為反對帝國主義這種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在中國共產黨北方區書記李大釗同志領導下，於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集會抗議，會後結隊赴段祺瑞執政府請願。段祺瑞竟命令衛隊開槍射擊，當場和事後因重傷而死者四十七人，傷者一百五十餘人。

白俄騎兵。這些白俄是蘇聯十月革命后被趕出國的地主、富農和貴族，他們騎着大馬在北京街頭亂跑亂闖。真是什麼人都來欺侮咱中國老百姓！

段祺瑞走了，張作霖來了。他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他的部隊駐在城外四郊，到處傳來奉軍奸淫搶劫的消息。城里每天斃人，說是防“赤化”，殺“暴徒”，城門口貼着“衛戍司令”王懷慶的大布告：“凡宣傳赤化、主張共產者，不分首從一律處死刑”。城牆上還畫着大幅的反共宣傳畫。鐵獅子胡同原來陸軍部後面，每天半夜裏都要抬出死難者的屍體。好幾次，我在街上拉車，看到一些青年被綁着押赴刑場，他們挺着胸、昂着頭，有的還喊口號。我聽不清他們喊些什麼，可我知道他們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我從心眼里佩服他們那種英雄氣派。一九二八年初，陰歷年剛過沒幾天，禮拜寺派人去找我，說“衛戍司令部”又斃了人，死的是個回民。按回民風俗，死者要由禮拜寺阿訇來沖洗，他們找我去幫忙埋一下。我去了，看見死者有三十多歲，留着長長的黑鬚，胸口一排子彈孔，血肉模糊。沖洗好了，我們把他抬到當時的“回民義地”（就是現在建國門外日壇公園西北角）。入土時，他妻子一直跪在前邊，懷里摟着個三歲左右的女孩子。附近站着三個穿黑長大衣的人，在那兒東張西望，象是來監視她們的“便衣”（特務）。別的什麼朋友、親戚都不讓來參加葬禮。這也不奇怪，那年月，沾上一點共產黨的關係，就要殺頭；反動派不是連孤兒寡婦都不肯輕易放過嗎？

一個伙伴悄悄告訴我：“聽說死的是個‘大共產黨’，叫馬

駿^①，是个‘鬧学生’（学生运动）的头儿。”那时候，我对革命没有什么認識，可我压根儿不信反动派的那套宣传，他們說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可我看到被他們杀害的淨是正正經經的青年人，这馬駿要是跟軍閥同流合污，給他們干事儿，軍閥还会杀他么？也許因为馬駿是回民吧，我对他的印象特別深。事隔二十多年，我还清楚記得埋葬他的情景。解放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馬駿同志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市委書記，我心里对他更产生了一种崇敬的感情。几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反动派的屠刀下牺牲了性命！革命的胜利，真是先烈們用鮮血换来的啊！

① 馬駿同志生于一八九五年，黑龙江省（前属吉林省）宁安县人。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的杰出战士。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即加入了党。一九二五年，党派馬駿同志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力量，杀害了党的北方区書記李大釗同志，北京的党組織遭到了破坏，馬駿同志奉調返国，担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書記，领导当时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十月被捕，在敌人的种种酷刑下，始終坚贞不屈。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馬駿同志壮烈牺牲，临刑前，他曾沿途高呼：“回汉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义时，他仅三十三岁。

第六回 国民党事事害人民 鬼子兵处处欺同胞

一九二八年六月，北京来了蒋介石的军队，把北京改名北平。城里升起了青天白日旗，电线杆上贴上了花花绿绿的标语，什么“民主自由”“男女平等”“解决民生”这一大串新名词。市面上倒也有些新花样，新在哪里呢？

头一件新事就是加捐加税，包捐包税，查捐查税。骡马行要包税，骡马的屁股上打了戳子；屠宰行要包税，猪肉上也打了戳子；生了孩子到派出所报户口要贴印花，娶媳妇买双龙凤鞋要贴印花，死了人领张抬卖证也要贴印花……另外还有缉私队专门负责查捐查税，发现反抗的，漏税的，就抓去关起来。一句话，一张嘴就是税，什么都是税，所以人称：“国民党万‘税’”。拉车的也逃不脱税，洋车夫都得买“号坎”^①，说是“整顿市容，以壮观瞻”。一尺多布的坎肩卖三块四。买了黄的，又让换紫的；换了紫的，又让换蓝的；变着法儿敲詐我们。

第二件新事就是外国货多。蒋介石的人占了北京，西洋货、东洋货就象决了堤的黄河水一样往市面上冲。中国的买

^① “号坎”是印有号码的专用坎肩。

卖给挤得倒闭的倒闭，停业的停业。记得那时候，南洋华侨实业家陈嘉庚的橡胶产品本来挺受欢迎。他的洋车胎只卖九元一副，后来英国的邓禄普车胎来了，把陈嘉庚的车胎给“顶”垮了。不久，邓禄普车胎独霸市场，价钱一个劲儿上涨。车胎涨钱，车租也跟着涨。水涨船高嘛，临了还是我们拉车的吃亏。我有时拉不上座儿，只得央求车厂掌柜的先交一半租金，掌柜的开口就骂：“他妈的，一副车胎几十块钱，你知道吗？交不了，你别拉了！”一边骂着，一边把我手头剩下的几个养家活口的钱也夺了去。

第三件新事是反动帮会组织特别盛行，什么青帮、红帮^①的，把北京的地头蛇都搜罗进去了。这帮家伙本来就不作好事，入了帮会更是无法无天。整天“伸手不离三，讲话不离潘”^②，游手好闲，横行霸道，只见他们砸戏园，闹妓院，在街上白吃东西不给钱，专门欺压穷苦善良的劳动人民。暗地里还不知道他们替反动政府干下了多少见不得天日的事情。有次我气不过，说他们是“偷米贼”^③。好，这就捅了马蜂窝，他们要狠狠揍我一顿。我一看他们人多势众，又有反动政府撑腰，斗不过他们，只得跑到天津避一避，在天津码头干了一年光景的搬运活儿，才又回到北京来拉洋车。

① 青帮、红帮，是历史上的秘密结社的名称。反动统治者曾利用这种帮会组织作鱼肉人民的工具。蒋介石就是靠青帮起家的。

② 相传青帮的“祖爷”是翁、钱、潘三人。这儿的“三”和“潘”都指此而言。

③ “偷米贼”是指翁、钱、潘三人曾广收徒弟，为清朝政府效劳，由运河输送粮食到北京的传说（原来运粮是走陆路）。

就这样，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家、地主、恶霸，天天在中国工农群众身上敲骨吸髓，任意抢掠，那算是“合理合法”的事；可老百姓穷得没法活下去，稍有一点不满就是“犯上作乱”，“无法无天”，给反动政府的侦缉队逮去，常常在天桥挨了剃刀。街上卖报的天天喊：“看一家四口集体自杀！”“要看大学生跳北海！”卫生局收路尸的，天天早晨满筐满车拉着走。连天安门前的护城河，也常有人投水自杀。警察局怕“有碍观瞻”，特别拉上铁丝网，还装模作样地竖了块牌子，写上什么“禁止垂钓”的字儿。真是活见鬼！其实何曾有人到那里去钓过鱼呢，这明摆着是叫人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自杀，以免“有失国体”，不过不好意思明说罢了。

男的失了业，找不上别的事干，也只好抄起车把拉洋车。那时，北平不过一百来万人口，拉车的倒占了十来万。这十来万人中，有十三四岁的孩子，有七十岁的老头。那些老头，说是拉车，也就是半拉半要，比要饭的多少强着点。大学生毕业了业找不上事，拉车还怕寒俭，头上戴顶大帽子，一条毛巾围着脸，盖得只露出一双眼睛。还有那些公教人员，物价往上涨，他们反倒减了餉。白天穿上长衫上街门上学，晚上脱下长衫也拉车。可拉车哪是好混的差事？一天，我眼见一个拉车的走着走着跌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吐血。后来听说，这车夫姓陈，人叫他小陈，劳累成病，没钱治，那天出了事，回家不几天就死了。他媳妇没法过，上了妓院。还有一回，我拉一位大学教授由西直门到燕京大学，路过海淀，我歇下揩把汗，见他打开了折扇遮着脸，头还扭过一边去。干什么呢？一问，原

来路边跪着“告地状”^①的是他的学生，他看了难受，又没法帮这个学生的忙，只好把脸遮了。

男的失业，女的更找不着事。蒋介石讲的是“男女平等”，平等在哪里呢？衙门里多了几个女秘书；饭馆多了几个女招待。小报有了材料了：不是清真馆里的小一号如何长，就是点心铺的小黑妞如何短。妓女愈来愈多，原先她们还在妓院里呆着，蒋介石的“男女平等”一来，北海公园出了“野鸡”^②。就连这些被迫跳进火坑的妓女也逃不过国民党的税，收的是什么“花捐”（肉体捐），真是叫人怒火三丈！

段祺瑞也好，蒋介石也好，旧军阀换了新军阀，外国人还是“太上皇”。旧军阀混战时，你来我去，城里常有兵祸。马车、大车、包月的洋车，都出钱买一面英美等国的小国旗插在车上，叫作“保险旗”。有了这面外国小旗，军阀的大兵就不敢拉差。这种怪事，蒋介石来了也还是照旧。在那东交民巷里，英、美、法、日、意……哪个帝国主义国家都设了兵营。外国兵到处乱闯，尽欺侮中国老百姓。拉洋车的遇着外国兵，就好象遇着瘟神一样。有一回，我跟见着一个拉洋车的拉个美国兵到了东单，那美国兵一边唱下流曲子，一边喝酒，喝完了举起酒瓶往拉车的头上猛的一下，砸的他满头流血，倒在地上。那

① 旧社会有的人乞讨时，把自己或自己一家流离失所、穷困无路的情况，写在一张纸上，铺在路边地上，或者直接写在地上，自己则默不作声地跪在或坐在一边，等待过路人布施哀怜。也有一些人，不是为了生活，而是有某种冤屈无处申诉，就公开披露在纸上，争取众人的同情、支持。当时这就叫“告地状”。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对旧社会的控诉。

② “野鸡”就是妓女。一种在街头巷尾游动拉客的妓女。



国民党警察平时对我们老百姓如狼似虎，吹胡子瞪眼，可见着外国人就象见了他老子，这时候见美国兵打了人，赶忙转过脸，躲得远远的，一声也不吭。打了人的美国兵大笑大嚷：“顶好！”晃着脑袋走了。又一回，我拉个法国兵到法国兵营，就是如今北京市总工会那儿，他下车抡起拳头朝我一拳，翻起车垫，把我好不容易攒下的几个钱一把抓走了。不管哪国的兵，他要到了地方不给钱，你算是不能要，一要准挨打。真让人憋了一肚子的气，总寻思找个出气的法儿。一天，我拉个美国兵从前门里美国兵营到苏州胡同日本妓院，让来回拉好几趟，也不给一文钱。我拉着拉着，瞅见街上有个美国兵顺手抄起小摊上的软柿子往苏州胡同口的一个年轻妇女脸上扔去。那妇女象是新媳妇的样子，穿戴得整整齐齐，给软柿子一扔，脸上身上，满处沾上柿子浆，站在那一时楞了。那个扔柿子的美国畜生哈哈大笑。我心里直往外冒火。坐在车上的美国兵还拍手叫好，同时吆喝我快跑。跑到苏州胡同里，这已经是第三个来回了。天黑了，我一瞅四围没有人，提起车把往上一掀，只听得扑通一声，那美国佬摔了个狗吃屎。我拉起车撒腿就跑，等拐了弯，才听见他晕晕乎乎地喊：“巡捕！巡捕！”

外国人打死个中国人没事，摔了个外国佬可不得了。第二天，苏州胡同来了好些国民党侦缉队的人，到处侦察：“谁干的？”可是老百姓对这些横行霸道的外国佬气儿大着呢，见了的也不告诉他们，到底没把我查出来。

第七回 卖鲜血穷人难还债 举大旗学生要抗日

紧跟着，我家一连出了几件祸事。有次，大兵把我连车带人抓了伙，由北平城往薊县拉，东西太重，半道把车轱辘压坏了，这才放走了我。可是车厂不答应呀！我央告车厂老板说：

“车是大兵给弄坏的。”

“你赁我的车，管谁弄坏的，你不赔谁赔？”

我要不赔，就再也赁不上车，我吃什么？没办法，只好托人上放印子钱的满族寡妇宛巴那里借钱。一元钱每天六分利。借的是四元钱，扣掉当天的利钱二角四分，到手的只三元七角六分。打这天以后，要是不能每天交出二角四分来，利滚利，驴打滚，这笔钱就算不清了。家里奶奶正病着，起初我没敢说借钱的事。回家第二天我出门拉车，奶奶嘱咐我：“二宝，我身上不舒坦，想喝口米粥，你今儿拉好了捎点米回家。”我只好回说：“奶奶，您将就喝点儿旁的，我还没钱买米——赔车子借了宛巴的四元钱。”奶奶一听发了慌：“哎呀，这可了不得了，借上了这阎王债，你往后一辈子也还不清呀！”她顿时急得心口痛。上年纪的人经不起折磨，挨到第七天就死了。奶奶死了不多日子，爸爸郁郁闷闷的，也生病死了。我左邻右舍到处

求告，好容易才发送了两个老人。

四元錢的債总也还不清。宛巴天天背着錢袋，拿着摺子^①，上門吆喝着收錢。我給逼得沒法子，大冬天穿着一套破夾袄破夾褲，赤着脚，天天去拉晚儿。那时白天买卖少，拉晚儿，正經买卖也不多，左右不过是拉些看戏的，跳舞的、找妓女的。可怜还有些女学生家里穷，晚上偷偷出来当暗娼，也作成我們拉車的几桩买卖。寒冬腊月的晚上，拉着車累得渾身淌汗，一停下来，汗水一結冰，夹袄夹褲一块一块冻得发硬，渾身透凉，只好站起身来原地跑步。拉一个晚儿就一晚不能歇脚。拉好了一天拉个块儿八角，扣了租金，扣下二角四分的利錢，还得挤出錢来还那四块錢的本。天寒地冻的，錢揣在身上，不敢进茶館喝一壺热茶。哪天遇上买卖不好，日子更不好过。

只要能掙着錢，豁出命去也干。我上协和医院卖过血，一次五百西西，得了錢还得給医院的門房送个人情。那时候的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办的，什么事都干得出，不知是为做什么試驗，买人脫光了衣服睡在滿是虱子的被窝里，讓虱子咬一个鐘头一块錢。人穷受人欺啊。

可卖血也救不了我，一时还不清那利上加利的高利貸。月月到結賬日子，我不敢在家里露面，天亮时分交了車，就上了“避难館”。那“避难館”，是朝阳門外一家茶館的后院。躲債的穷人、沒去处的叫化子，花上几个錢买个地下的座位，能坐上一宵打个盹。可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呀！这四块錢的債

① 摺子，即記賬的本子。

压得我这个壮年汉子喘不过一口气来。只好多奔少吃，该吃三碗的吃两碗，省下一碗还她宛巴的閻王債。两条腿足足奔了二十一个月，身上沒奔出一件衣裳，脚下沒奔出一双鞋，可总算把那笔要命的債还清了。

刚还清了債，心想凭着一身气力，好好的干，攢些錢也好买輛車安頓下来。哪知道旧社会沒我們老百姓的安穩日子。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往后，国家愈来愈不象个样子。日本軍隊在关外炮轟沈阳的北大营，蔣介石来了个不抵抗，下令要几十万东北軍一枪不放，退进了关里。三个来月的時間，东北三省全都断送給日本鬼子了。难民都挤到关里。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打日本鬼子，倒去請求什么“国际联盟”^①“主持正义”，那国际联盟也是帝国主义者掌着权，哪安着什么好心眼？一九三二年的一天，我拉車到前門車站去，只見站上挂滿了彩色旗，国民党的官儿点头哈腰迎来了什么国际联盟的調查团。里头尽是些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說是来調查日本人有沒有侵略行为。我的天！那东北三省又不是芝麻大一点儿，我听人說有八十多万平方公里，比两个日本本土还大得多。日本侵略者占了中国的这么一块大地方，那还用調查？那些調查团的外国人住在北京飯店，白天喝酒宴会，晚上和翻

^① “国际联盟”，又称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將結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倡議成立国联，企图通过它来瓜分战败国的殖民地。一九二〇年一月，国联成立后，实际上操縱在英、法手中，美国一看不能达到原来目的，就拒絕参加。国联用委任統治的形式，对殖民地进行了帝国主义再分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联停止了活动，一九四六年正式宣布解散。

譯一起出來，叫我們拉着洋車給他們找妓女。我們不願找，他們就拿酒瓶子砸。他們哪里是“調查真相，主持公道”啊！明擺着是和日本侵略者一鼻孔出氣，也來凌辱咱們中國老百姓。

調查來調查去，東三省不見還給我們，熱河省接着又丟了。日本鬼子得寸進尺，又想占華北。老百姓怒氣沖天，忍無可忍，可是蔣介石還發布了一個“睦鄰令”，要跟日本“攜手”、“和睦相處”。茶館里、戲院里滿處貼着“莫談國事”的字條，意思就是不准誰說一句對日本不滿的話。誰要說了句“日本強占東三省”，就有被抓去蹲監獄的危險；誰要說了句“維護領土主權完整”，這就有“抗日嫌疑”，就算犯法。蔣介石政府有個駐北平的“中央憲兵第三團”，三天兩頭抓人，不知道捕殺過多少愛國有為的青年。

反動派不准老百姓抗日，漢奸們卻可以“自由”活動。我常給拉車的一個主顧，早先是清朝的大官，這時候又穿起了他當年上朝的黃褂子；他辮子早剪掉了，這時候又把辮子縫在帽沿上，口口聲聲把日本扶植的“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稱作“皇上”。有個大漢奸殷汝耕，原是國民黨的專員，搖身一變，成了日本的兒皇帝，在通州（現通縣）成立了一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有一次我拉車到通州去，見那兒正忙着蓋“自治政府公署”，滿街游蕩的淨是漢奸、流氓、日本特務。通州離北平才四十里地，已經成了日本的天下；北平城名義上雖然還是中國的領土，實際上也等於已經淪陷了。日本的轟炸機在北平上空低飛盤旋，日本兵在北平城郊每天乒乒乓乓地打靶。日本浪人滿街亂串，任意為非作歹，大白天搶劫東安市場，在中山

公园里强奸中国妇女；又在北京飯店和东四牌楼一带，开设賭場、妓院、大烟館。日本侵略者就这样一手吓唬中国人民，一手腐蝕中国人民，真是軟硬兼施，毒辣已极。好好一个北平城，給他們鬧得烏烟瘴气，暗无天日。有些汉奸在日本主子指使下，花钱雇了一批流氓，烟鬼，上街吵吵嚷嚷地“示威”，并且向国民党政府軍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請愿”，要求“华北自治”，实际上就是把华北送給日本。国民党政府不但不禁止，还派出警察一路保护他們的安全，你說气人不气人！再这样下去，中国人早晚全得成亡国奴。于是学生們上街游行，要求抗日，国民党的警察、大兵对汉奸、流氓百般保护，对青年学生却用水龙、大刀来对付。那正是一九三五年的三九天气，警察用水龙对准游行队伍噴水，学生們的头发上、衣服上都結成了冰。城里到处发生打学生的事件。可是抗日爱国运动是打不散、打不垮的，学生上街游行的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壮大。我在宣武門外看到的那回，国民党把城門都关上了，守門的大兵、警察，枪上都插着亮閃閃的刺刀，学生們一点也不怕，就在城門边展开宣传，高声喊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打倒汉奸卖国贼！”“抵制日本貨！”等口号。就在那几天里，有的学生还塞給我一卷紅紅綠綠的标語，要我給貼到大街小巷去，那上面写着：“反对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收复东北！”“日本帝国主义滾出中国去！”……我打心眼儿里全部贊成。事后我才知道，那陣子的“鬧学生”，就是轟轟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鬼子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

“蘆沟桥事变”^①。来势汹汹，真象要一口吞下我們这么大的中国。蔣介石政府吓得屁滾尿流，夹起尾巴往南边跑。鬼子占了北平，汉奸老頑固都出来組織“維持会”^②，帮着鬼子逮人，逮着青年一卡車一卡車往陆军部送，只見进去不見出来。男的被运到日本去做苦工，女的被送去“慰劳皇軍”。街上人心惶惶，粮价涨，东西缺，拉洋車的挨打受罵数不清，一天也卖不上几个座儿。碰上倒霉天，日本兵和汉奸白坐了你的車，还說你“侍候不周”，給你几个耳刮子，生活实在熬不下去了。

① “蘆沟桥事变”，也叫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的开始。一九三七年六月起，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宛平附近，連續举行挑衅性軍事演习，准备发动吞并全中国的侵略战争。七月七日夜，日軍借口一个士兵失踪，提出进城搜查和撤退中国駐軍等无理要求，遭到当地中国駐軍拒絕。接着日軍就炮轟宛平城和蘆沟桥。当地駐軍不顧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击。八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面抗战，从此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② “維持会”，是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利用汉奸在中国淪陷区建立的一种临时性的伪政权組織。

第八回 当劳工受尽人間苦 爭自由逃出虎狼窩

就在那时候，有一天，我看到一张“新民会”^①招人的告示：說什么到外地去干活，挣錢多，活儿輕，“以工代賑”。我一想，反正在北平也是沒轍，心一橫，就去报了名。

我們在前門上火車，到山海关呆了三天。各路人馬集合照象，办“出国証”。你当是去外国啦？不是。那时中国人到自个的国上东北，就算是到“外国”——日本侵略者統治的“滿洲国”。

从山海关出发，就不讓我們坐客車了。一百人装一节悶罐車，鉄門一鎖，悶得发慌，吃喝拉撒，全在里头。車廂全是鉄的，鉄板的底儿渗不下水，老是被尿尿浇得湿漉漉、臭哄哄的。不但人坐不下去，連干粮袋也得成天在手上提着。那滋味甭提多难受了。

到吉林省九站，下了車，讓我們排成单行走。那时候是一

① “新民会”，抗日战争时期的敌伪特务組織。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后在淪陷区各省、市、县設立分会。曾开办“新民学院”，訓練汉奸、特务；出版《新民报》，宣扬“中日亲善”和所謂“东亚新秩序”，以毒化淪陷区人民。

九三八年的三月初，关外正飘着雪片，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日本兵拿着枪押着我们，“拉杆的”（汉奸把头）提着哭丧棒，瞅着我们稍不顺眼，就往死里打。有的人停下来小便，拦腰就是一棒，说是怕掉队。撒尿，也得走着撒。

天傍黑，我们过了松花江，摸着夜路走，小半夜才走到永吉县的大口前屯，用席子盖的人字窝棚早搭好了。屋里四壁透风，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没铺没盖的，冻得上牙打下牙，一夜没法睡熟。

第二天一早，“拉杆的”就来了。十多个人拿着剃头刀，抬出一大锅滚热的肥皂水，要给我们挨个剃头。有些留分头的学生子不愿剃，刚说出个“不”字，劈头就是一镐把，好汉不吃眼前亏，谁还敢说个不字。这个头也剃得怪，光剃了左半拉，右半拉留着半月以后轮换剃。接着发给我们每人一条奇怪的裤子，左边裤腿是蓝的，右边裤腿是白的。穿上两色裤，留着半拉头，怪模怪样的，好叫你逃不过鬼子兵和汉奸的眼睛，跑不了。随后一人发条绳子、一根扁担、两个籬筐、一把铁锹。叫我们往舒兰县修火车道。我们问“这就叫‘以工代赈’吗？”“拉杆的”鼻孔一哼，挥舞着镐棒，大喝一声：“什么‘以工代赈’，别他妈的作梦娶媳妇，尽想好事啦。这是给‘日本大林组荣记公司田家大柜’当劳工。往后干‘三九点’的活，见天早三点起床，晚九点收工，晌午饭在工地上吃，好好的干活，不许怠慢。到年底可以放你们回去。磨洋工的有好瞧的！”我们这才知道上了当。

往后，我们每天三星未落就起床，喝了玉米渣子粥，顶着

刺骨的寒风去上工。一天干十七八小时的活，只有晌午啃凉窝头时才能躺在道旁的土坡上，歇个把钟头。一天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不说，还动不动挨打。我头一天上工，把土筐放在地上倒土，“拉杆的”瞅见了，从背后绕过来，一个闷棒打在我的腰眼上，疼得我两眼冒金花，咬牙切齿地喊叫：

“唉哟，干嘛打我？”

“谁叫你放下筐子倒土，动作太慢！磨了洋工还顶嘴，老子的棒儿就是不认人！”说罢又搯了我一棒。

我硬挺着痠疼得直不起腰来的身子，还得挑起筐子小跑，到了填坑处，一手顶着扁担，一手提着系筐的绳子，晃晃悠悠往外倒土，籬筐再也不敢沾着地。有些身子骨儿单薄的青年学生，没有力气提着筐子悬空倒土，常常连人带筐跌下坡去，遭罪可大啦！

干了三四个月下来，人已折磨得不成样子了，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走路打飘飘。和我同窝棚住的有个康万有，光景更可怜。他本是北平打首饰的银匠，别瞅着个子高，身子却单薄，象根麻秆，很容易折断。他一向干惯了精巧的细活，浑身没力气，不幸被骗来当了劳工，怎架得住成天象牛马似的苦熬重压。

七月大热天，大伙成天在红火毒日头下干活，扁担都发烫，全身也快冒烟了，汗珠子象雨点子似的往下淌。康万有因为吃久了咸盐豆，上了火，眼角糊满了眼屎，鼻孔也堵住了，只能用嘴巴来呼吸。他挑上两筐土，一步一喘气，眼红筋胀的，吃力极了。“拉杆的”瞧他挑得少，走得慢，一个飞步跑过来，

狠狠一鎬把，就把他的脚踝子骨打断了，还呲牙咧嘴的罵着：

“好个王八羔子，看你还搗蛋不搗蛋，再磨蹭就扒你一层皮！”

“唉哟，我的媽吔，……”康万有一咕嚕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我們瞅着自个的弟兄凭白无故挨打，心里都在暗暗咒罵那些“拉杆的”。

晚上收工时，我架着康万有回到窝棚里。他脚脖子肿得象小桶，一触摸就疼得要命，瞧着真叫人揪心。他翻米复去折腾了一夜，媽呀娘的罵个不停，大伙瞅着他干痛，听着他惨叫，也沒法弄点药治一治，心里也象火烧火燎的，焦急得不行。

第二天，我們想讓他在窝棚里歇着，打更的却不准，“拉杆的”也硬往外撵。沒奈何我們又只好把他扶到工地上，讓他躺在道旁边休息。沒几天，他的伤口烂了，流脓流血。一大群蒼蝇嗡嗡地圍着他的脚脖子轉，有的爬在伤口上争脓逐臭，他觉着又痒又痛，也沒有力气坐起身来，弯腰赶一赶。一天上午，忽听得一陣得得得的馬蹄声，只見大道上黄尘滾滾，一个鬼子軍官耀武揚威地跑过来。他远远瞅見地上躺着个劳工，就匆匆下了馬，轉过身来一脚踩在康万有的小肚子上，罵罵咧咧的：“巴格呀魯，你大大的坏了，干什么的不干活？”

我赶紧跑过去把康万有的褲脚管掀开来，指着伤口給他看：“你瞧瞧，他脚杆肿得象小桶，还能干活嗎？”

那家伙連看也不屑看一眼，赶忙捂住鼻子，挡挡臭气，从牙齿縫里，吐出几个万分狠毒的字眼：“干不了的统统死！中国人大大的有！”

“拉杆的”过来不問三七二十一，搽了我一鎬把：“你还站在这里扭着腰干什么？有嘛好看的？你气儿粗了，皮子痒了，快滚回去，老老实实的干活。”

“康万有腿坏了，不能干活，我不能讓他瞧瞧嗎？！”

“誰叫你他媽的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他說罢又向鬼子軍官点头哈腰：“是，是，是，这家伙大大的坏，躺倒不干。太君你莫生气，我有本事讓他干活，你瞧着。”

“拉杆的”轉身找来根繩子，把装满黄土的籬筐套在康万有的脖子上，逼着他拖着土筐，在滾燙的洼地上爬来爬去的运土。大伙想想，这还象个人嗎？連牲口也不如！牲口伤了蹄还得歇歇腿啊！我們在一旁瞅着，眼泪可只好往肚里咽。这亡国奴的滋味多难受呀！人們都說黄连苦，它比黄连苦十分哩！

好容易挨到中午时分，大伙听见哨子一响，都搶着去拿上千粮，随便找个土坡坡躺下来。一个个累得半死，闭着眼睛，一手拿窝头，一手拿咸盐豆，一口一口地往嘴里塞，嘴角流着白沫星子，干渴得嗓子眼冒烟。

康万有沒去拿干粮，后来才发现他在斜坡下面的一棵树上上吊了，我們赶紧去把他放下来，不幸人已断了气。想来他是受不了那份折磨，趁人們不留意，一咕噜滚下斜坡去，瞅准那里有棵树，就解下脖子上的繩子，寻了短见。对着他的尸体，我們心里都象刀割般难受，眼里噙着泪水。他，活得多苦，死得多惨呀！仇恨的烈火，在我們每个人的心里燃烧着。

日本鬼子怕我們逃跑，每天晚上把我們的褲子都收了，鉄鍬也集攏来，放在窝棚外，拿鉄鏈子鎖着。外面有打更的，还

有巡邏警，很难逃得了。有个姓曹的伙伴，舅舅在辽宁鉄岭作买卖，他一来不久就想逃出去。一天，天不亮，他偷偷溜掉了，沒跑出半里远，就給抓了回来。十来个“拉杆的”围住他，用鎗棒沒头沒脑地毒打，打得他血肉横飞，嘶声惨叫。“拉杆的”还讓大伙瞅着，想“杀了鸡子吓吓猴”。可誰有心思瞅着弟兄受苦，一个个泪花儿在眼眶里打轉轉，都别过脸去，恨得牙痒痒的。这姓曹的还没断气就給“拉杆的”拖走了，以后再也沒有回来，也不知被扔到哪个山洼洼里喂野狗了。

几个月下来，工地移到了缸窑。跟我住一棚的十个弟兄很快就沒了三个，打死的，病死的，全摊上了。我們剩下的七个人有天晚上躺在窝棚里，翻来复去睡不着觉，想的心事可多啦！看来不跑早晚是个死，跑了抓回来，算倒霉，万一逃脫了，还有老子一条活路。現时不象初来那样防得紧了，因为鬼子汉奸已經从劳工身上賺够了血汗錢，淨想吃喝嫖賭怎么花了，眼下逃跑倒是个好时机。大伙商定第二天中午吃飯休息時間，趁“拉杆的”打盹的时候，拿起鉄鍬就往榛树林子跑。“拉杆的”追来，七把鉄鍬和他拚了。榛树林子密密实实的，鬼子兵的枪子也未必能够飞到脑門上。“人心齐，泰山移”，大伙的决心就这样定下了。

第二天晌午，我們趁“拉杆的”正打瞌睡，一个个假装小便，站起来，拿起鉄鍬就往西北方向猛跑。霎时后面就传来了“拉杆的”喊叫声：“跑了，跑了，有人跑了”，“快追，快追，追，追……”，鬼子兵的子弹从我們的头頂上飞过，我們只顧往头前的树林子冲，跑得連心都快蹦出来了，好不容易才鑽进了榛树

林子，喘了一口粗气。回头一看“拉杆的”跑得气急败坏的，还远远落在后面，见我们鑽进了密林，又带着铁家伙，准备和他们拚，更不敢舍命来追了。我们怕暴露目标，就在林子里分散爬行，打算天黑以后再走上大路去。

第九回 落陷阱挖煤琿春矿 入牢籠苦睡薄板棚

我們摸黑走了一晚上，天亮时才踏上了江边的一条馬路，过河的老乡瞅着我們怪模怪样的打扮，都吓得直跑，連問路都不好問。我們只好各奔前程，免得太集中了招眼。这一带有日本守卫队，抓住了可不是好玩的。出了虎口的小鹿，再被豹子叨去也太不值得了。

我晓宿夜行，来到了舒兰县的三前槐屯。我是个回民，回民找回民，到了一个清真寺，寺里的小学有个老师对我很热情，赶忙找条褲子来，讓我換下那条穿成破布条似的两色褲，随后又拿出把推子，給我推光了半拉头，打整得象个平平常常的人样。他好不容易湊了两块多錢，热呼呼地递到我的手里，說：

“老哥，不是我不留你，实在是因为咱們这儿查外人查得紧，誰沒有劳动票（即身份証）就要被鬼子抓回去当劳工，誰家窝藏沒劳动票的人也要受罰。眼下屯子里已实行了連环保。一家藏人，十家受罰，我家答应藏你，別家也通不过呀！”

我謝了那个小学老师，一路經過了好些城市和乡村，討飯吃，打零工，啥都干过。那年头沒“劳动票”不光找不到差事，

連住店，坐火車都不行，經常有警察來抓。我老惦着回北平老家，就一個勁往西南方向走。東游西轉，躲躲藏藏，好容易走到了沈陽（當時叫奉天）。

我在沈陽不敢住店，今天睡城門洞，明晚又移到城牆上睡，身上隨便蓋張草帘子，哪里擋得住關外十月的风寒。我和一群無家可歸的人只好用草帘子圍上個避風的圈圍，大伙緊緊擠在一起，倒還暖和些。白天，我們就三五成群出去找零活干。有天上午，碰到個姓劉的和姓賚的來找人去挖地槽，我們瞅他倆說話還和氣，心想去賣兩天力氣，總比餓肚子強，就跟着去了。我們又不熟悉街道，全憑他倆擺布，奔北門，過白塔，到馬家灣，走來走去卻走到了日本人開的天泰大棧房。我一瞧，糟了，正想轉身溜走，迎面出來了個戴眼鏡、留分頭的日本人，名字叫野口。身後跟了一大幫漢奸，呼拉拉就把我們押進了棧房。原來那個姓劉的和姓賚的不是正經買賣人，是“滿洲勞工協會”的特務。我心一涼，也只好暫時留下來再作打算。

關進天泰棧的勞工，一共有八十多人。在陰濕的房子里呆了五六天，野口才把我們提出來，命令漢奸在我們的背上，一人縫上一塊白布作記號，鬼子兵和漢奸押着我們走進鐵棺材似的閘子車。上車前，野口還翹起八字胡，皮笑肉不笑地嘿嘿兩聲，陰險地對我們說：

“這回是送你們到吉林琿春去，那里土壯民肥，還出金子，真是大大的有！便宜你們了，中國勞工們，快到琿春發財去吧！”

他的嚎叫還沒落音，鐵門咔嚓一聲就關上了。我們心里

都清楚：什么发财不发财，这回准是又打进十八层地獄，能撿条命回来就是万幸了。

琿春县早先确实是个“土壮民肥”的好地方，出产砂金、煤炭、水稻、玉米……。可是打从日本鬼子占领以后，就被搜刮得民穷财尽了。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小伙子拿装洋灰的纸袋子作衣裳是常事。那里本来产大米，老百姓却吃不上大米。日本鬼子怕中国农民私碾大米，连老乡家的碾磨也给没收了，米坛子也给砸碎了，产的稻麦全归日本。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就算“国事犯”。日本特务整天在街上转游，他要怀疑上你，就用根长筷子探你嗓子眼，你一恶心真要吐出颗米粒儿来，马上给押送到牡丹江的集中营去，一去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我们在铁闷罐车里坐了一天一宿，来到琿春县的喜多山，下了黑古隆冬的煤窑。常言道：旧社会的煤窑是“四块石头夹块肉”，人进了煤窑就象入了活地獄一般，死了不用埋。这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双重统治的煤窑，光景更比一般掌柜开的煤窑黑暗得多，下面让我来细说说吧。

先说衣食住行的景况。我们在琿春当了七年劳工，总共才发两套衣服。一身蓝粗布的单衣，一身更生布的棉衣。名为棉衣，撕开来看，里面絮的不是棉花，全是蒲棒，象一堆乱草，又扎人又不暖，好些人在大寒天刚领下这身“棉衣”，一看麻袋似的面，草包似的里，都伤心得哭了。吃的东西刚去还凑合，早晚两顿玉米渣子粥，中午有个窝头吃。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鬼子要征调更多的粮食用在侵略

战争上，给劳工吃的就净是橡子面了。这东西嚼起来象石沙子，酸臭酸臭的，拿去喂牛都不沾。人吃了肚子胀鼓鼓的，屎都拉不出来。每次大便，都得蹲到高岩上去，使足了牛劲，痛得唉哟唉哟的直叫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拉出来的屎象根香杆子似的，又细又硬。不管你有什么情由，五天不下井就得停伙。有一回，我给煤车挂钩时稍不小心，左手上的大拇指被撞断了，成天价火辣辣的鑽心疼，不但没药治，连歇歇也不敢。怕的是一不下井就不给饭吃。我当时见到鬼子工头和汉奸只好把左手藏在裤袋里，或者让弟兄伙打打掩护，隐瞒过去。一个断指头，用点破布条包起来，足足烂了七个月才长成个死肉疙瘩。那些日子隔几层布都闻得到臭气，差点把人痛死！说起住的，也够惨的。一色的薄板棚子，风一个劲往壁缝灌。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晚上睡觉就盖张草帘子。睡的倒是热炕，可背后烫红了，胸前还冻得起鸡皮疙瘩。几十个人挤在两铺对面炕上，每间工棚都有鬼子宪兵队的“甄别员”陪睡，谁在夜里说了句骂鬼子工头和汉奸的梦话，就给记上了。这种特务一直陪我们睡了四年多才撤走。你说那阵人还有什么自由呢？当了亡国奴，连做梦的自由也没有啊！“行路难，命相连”，那时可是寸步难行哩！每天上下班都是鬼子工头、汉奸把头拿着棍子押着我们下井出井。你想逃跑？那是梦想。琿春县靠近国境，关卡严极了，铁丝网、宪兵队、检察哨……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着。抓回来的逃犯十有九个都被送到太阳村去。这太阳村有个大地主汉奸叫韩大麻子，专门养着一群恶狗，劳工一解到就扔到狗圈里，全活活的给撕碎了。

再說說干活是咋样。我們那时下井是六六制，早晨六点上工，晚上六点收工，晌午飯送到井下吃。我們干的是掘进活，五个人一掌子，一天出十二車煤，不管煤层好賴，达不到定額，鬼子坑长里村就堵住井口不讓你出井。煤层不好，出不够数，哭也得哭出来。还不讓你挑选好的煤层打，查出了，說你“破坏矿井”，要枪毙。工具又不好。我們使的麻花釵子淨爱秃头。有时打眼打不动，往回取不出来，二百二馬力的电鑽老頂在肚子上，肚皮磨紅了，腸子都快燙熟了。我們掌子有个刘玉庆，有回釵子卡在坏煤层里，一时抽不出来，鬼子工头公內偷偷溜来瞅見了，說他故意磨洋工，提起軍棍就朝他的腰背沒头沒腦地打去，打得他口吐鮮血，沒过几个月就死了。煤矿的通风設備极坏，老出瓦斯。別的事故也很多，死人就象家常便飯一样，差不多每天都有。我記得有一回井下冒頂，一下就压死四十多人，鬼子工头还在井口拉上了电网，根本不讓井外的劳工下去搶救。

那年头，有点伤病可不敢讓鬼子工头和汉奸知道。他們要是瞅見誰有个病痛，不但不給治，还要把你打入“白宮”。这“白宮”就是所謂休养室，屋里不生火，洒上一圈石灰，說是“消毒卫生”。伤病号躺在里面，不給吃喝，睜着眼睛等死。要是有人瞅着可怜，偷偷給送碗水，送口吃的去，被发现了，也会一起关进“白宮”，为的是“防止传染疾病”，一进去就甭想活着出来了。这些伤病号還沒咽下最后一口气，往往就一絲不挂的給扔到山下的枯骨亭和万人坑去了。在那里，野狗、恶狼、烏鴉成群結队的爭搶死人肉吃。我們掌子有个姓林的弟兄，在

井下塌方时腿被砸断了，左手腕骨头也露了出来。鬼子一瞅见他受了伤，立刻把他抬进“白富”，就这样活活地给折磨死了。

吃长了橡子面，心里潮得慌，总盼望能有口正经粮食吃。那些年我们干的又是井下的重活，成天甩镢头，打炮眼。“人是铁，饭是钢”，老吃橡子面，哪能受得住！

要想换点粮食，就得自个想想办法，冒点风险。我们知道附近的朝鲜族老乡暗藏有粮食，只要给他们一些急需的东西，多少是能换点出来的。可是我们穷得没衣服穿，哪能拿出什么值钱的东西来换呢？琢磨来琢磨去，才想出个在生产上“捣鬼”的巧办法来。

我们在放炮之前，小心翼翼地吧引线上的丝线解下来，然后下掉雷管。这样一来，火药外面，全是纸皮，湿了不响，干了又爆炸得快，危险很大。为了换口正经粮食吃，豁出命来也得干。就这样日积月累，我和杨子明两人好不容易才积攒下半斤丝线。

一天傍晚，我跟老杨带上丝线，偷偷溜到二里沟。我们用丝线向一位朝鲜族的老大娘换了三十斤老玉米。当时我们穿的是洋灰纸袋子改作的外衣，三十斤老玉米把一身上下都装得胀鼓鼓的，活象个大胖子。

夜黑黝黝的，伸手看不清五指，我们飞快溜进矿门，不巧，正碰上了鬼子特务。杨子明远远跟在后面，一瞅风色不对早溜掉了。我正想转身逃跑，那特务一把抓住我的领子，大喝一声：

“站住！干什么的？”

“挖煤的，下了班出去蹦蹦跳跳。”

“蹦蹦跳跳，說的比唱的还好听。你身子咋这么胖嘟嘟的？一准大大的有！”

我一听，糟了！他看出我的秘密来了。正想就地一滚，赶紧跑掉。不曾想他提起我的衣领一抖，嘩啦啦一声，玉米粒儿全从纸袋里掉出来了。他不问青红皂白，左右开弓，打得我满嘴流血。随后就用手枪顶着我的背脊梁，把我押到警察所去。

到了警察所，他们问我向谁买的，我想，不能照实说，要不就害了那个朝鲜族老乡。我矢口不说实话，只说向一个过路的老大娘买的，也不知道她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他们问不出个水落石出，就拿鞭子一个劲抽我。我躲躲闪闪，直往后退，一退退到一条狭长凳上。

几个鬼子特务一把把我按到那条长凳上，把我的手脚反绑起来。一气灌了我三壶辣椒水，害得我眼睛烂了几个月，鼻子长时期火辣辣的痛。有个特务更狠心，他见我生死不招，就把我的嘴巴使劲掰开来，用刺刀上的卡口给我咔嚓一下，硬生生的撬下两颗门牙来！我顿时满嘴喷血，疼的差点昏过去。

为了吃几颗老玉米，我受了多大的洋罪呀！这还不够。随后鬼子特务又把汉奸把头王和悦找来，向他要了一百元的罚款。把头掏了钱，岂肯善罢甘休！回去就串通另一个鬼子特务商吾来打我，逼我手举凳子跪在地上，我硬不跪，他又叫汉奸翻译赵海川找根胶皮管子来打我。赵翻译又使了个坏心眼，偏找了根细的胶皮管子来。这细胶皮管打人最疼最伤骨

头。为的是我平时沒有送錢送礼給他,这坏小子和我結下了仇气,也想瞅着空子火上加油,整我一頓。我一看赵翻譯拿来根細胶皮管,怒火一冒三尺高,心想反正活不成了,不如先下手为强,先教訓教訓这坏家伙两鞭再說。我夺过鞭子来就先打这汉奸翻譯赵海川。他捂着脑袋边跑边喊:“反了,反了,这小子要造反了,赶快送他到宪兵队去!”

这时候三道岭的掌子面正缺人干活,把头丢了錢,还是想多出煤賺錢要紧,就和商吾嘀咕了几句,立刻把我推下井里去挖煤,好歹才算檢回一条命。

第十回 美国佬援助国民党 弟兄伙围困救济署

我在琿春县，就这样过了七年，真是一条小命悬在刀尖上，一天一天苦熬过来的。

一个初秋的下午，鬼子兵忽然拿着大刀、步枪，把全矿两千多个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全往井下赶，一赶下井就把井里的电停了。平时井下的大水泵不停地开，还常常冒水，这一停电，水泵开不了，水立刻往上涌，不是存心想淹死我们吗？他们的心多歹毒呀！我们也不能白白等死，一个个拚命从斜坡往上爬，赶挣扎到井口，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出外一看，矿上的日本鬼子全不见影儿了。只听得从中苏边境的方向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我们爬上山头一望，到处是烟雾腾腾，火光闪闪。原来是我们的盟邦苏联向日本宣了战，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红军打得日本侵略军丢盔弃甲，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高兴得掉下泪来，庆幸自个又有了活路。

过了几天，红军来矿上，看到我们一个个穿得象叫化子，饿得皮包骨头，就打开日本仓库来分些东西给我们。开仓一看，里面装满的大米高粱都长了一寸多高的绿毛毛。日本鬼子净给我们吃橡子面，放着这么多上好的粮食在库里发霉发

烂，真能把人气炸！我們有了飯吃，又分到了毛衣毛毯，苏联紅軍就組織我們到边境去修路。

我在边境干了两个月活，掙了几个工錢，就想回北平老家看看。火車不通，我有两条腿。我跟同路的人走到延吉，碰上了八路軍。一个大高个子、南方口音的軍官，在車站上对着成千上万南行的旅客，大声喊道：

“同胞們，你們当了十四年的亡国奴，吃了无数的苦头，急着想回关里看看，也是合情合理的，我們非常同情你們。只是前面的道很不好走，日本鬼子虽然投降了，美帝国主义又闖进中国来了。蔣介石反动派引狼入室，在美帝援助下，到处調兵遣将，搶占城市，大发劫收財，还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內战，妄想夺取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我劝你們不如留在这边，将来和我們一道过江。当然，你們一定要走，我們也决不阻拦。……”

当时我对八路軍缺乏認識，加上离家多年，好容易出了牢籠，心里一个劲儿想早些到家里看看，听了那些話还是往前挤，急急忙忙的过了江。

我們在哈德湾过了江。一过江就碰上了国民党中央軍第七十一軍八十八师。老百姓管他們叫“刮民党”“遭殃軍”，这話一点也不假。我們一接上茬，就領略到他們的强盜嘴臉了。他們把我們口袋里的錢，穿的毛衣，帶的毛毯，凡是帶毛字号的，全搶去了，說是“征集軍用品”。我跟他們爭吵，他們拳打脚踢，开口閉口：“他媽的，老子抗战八年，你还不服？”我心想，日本鬼子打来的時候，你們早就吓得屁滾尿流，跑的沒有影儿

啦；这会子鬼子投降了，你们又返回来耀武扬威，大发横财，还浑充什么英雄，当狗熊倒是货真价实的。我们深深后悔没听八路军的话。这些“抗战八年的英雄们”把我扒得只剩一件单褂子。没有辙，我只好一路卖力气，打零工。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在路上，常碰到“遭殃军”枪毙逃兵，我怕给他们抓去填炮眼，老是躲着他们走。好容易到了沈阳，才寻着个什么机关登下记，发给我们每人一张条子，说是可以送我们到天津，然后自个回北平找事，寻不着事还可去找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①想想办法。

我就这样回到了一别八年多的北平。晚上在前门站一下火车，就碰到戒严，把我们圈在铁栏杆里不让出去。我看到戴白盔的美国兵也出来巡逻，心想在中国地面上戒严关你美国兵什么事，也出来站岗，你算是老几？

第二天早晨一解严，我就寻到如今的北大医院那儿，找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北平分署，让他们瞧瞧我的条子，要求帮忙找个事儿。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国人看了条，恶声恶气地说：“你想得倒美，把你送回北平就是好的，还想找事。你睁眼瞧瞧，如今北平还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天天来吵着找事没着落呢，还有空儿安插你个大老粗？”我还想和他蘑菇，他跳出柜台来

^①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一九四三年成立。这个机构名义上是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及其人民，实际上为美国操纵。美国通过它吸收各国捐款，购买美国的剩余物资，解决美国自身的经济困难；并借救济活动拉拢、欺骗、麻痹接受救济的各国人民。同时，美国还力图通过救济来支持反动势力，如支持蒋介石集团进行内战。

就把我推出門去：“瞧你模樣象个討飯的，穿得破破烂烂的，跑到这儿来有碍观瞻，‘盟軍’看到了成什么体統？快滾出去！再不走我就要叫警察了。”

我无精打彩地走过北海金鳌玉螭桥，想到崇文門外找我那作童养媳的姐姐去。走到东四、东单一带，人就特别多起来。有叮叮当当换銀元的，有涂脂抹粉拉客卖身的，有卖旧衣破衫書本杂货的，还有不少匠人苦力……。这些卖力气的人站了一长溜，把条人行道挤得滿滿蕩蕩的。他們身边还摆着刮刀、斧头、鋸子、鉄鍬一类的工具。突然一輛美国卡車开来，叫人到南苑干活去，大伙不要命似的往車上挤，美国兵見上的人多了，就揚起皮靴往車下踢人。被踢着的人正唉哟唉哟的惨叫，后边不远处又猛地传来一声“救命”的惊叫。原来是两个喝得醉醺醺的美国兵把一个身穿花棉袄的年輕妇女一把拖上吉普車，抱在怀里，橫冲直闖的開車走了。警察們躲得远远的，不但不去救人，还在一旁赶散那些涌上前去想和美国兵評理的同胞弟兄，帮他們的美国老子“維持秩序”哩！

我对这个乱七八糟的社会恨极了，一路上看到的尽是伤心气人的事。赶到了崇文門外姐姐家一間，全是人生面不熟的人。在附近找到个姓鮑的老街坊一打听，才知道我姐姐和姐夫早在日本鬼子統治时期吃“共和面”^①那年餓死了。我一听，眼泪止不住喇喇的往外流。旧社会害得我家破人亡，六亲

^① “共和面”，一种没有什么正經粮食的混合面，主要是由豆餅、麸子、瓜干、白薯干、玉米渣、高粱渣、玉米皮、稗子、橡子面等等玩意儿，掺着土块、沙石、柴草棍等一起磨出来的。

无靠，真想点上一把火，把这个黑暗的社会烧个干净！

馬不停蹄地跑了一天，一点收获也没有。天黑了，我到一家小飯摊上去喝了二两烧酒，心煩得要死。想到我在朝阳門外还有个出了閣的小妹妹，不如奔她去。就立刻往朝阳門赶。赶到了朝阳門，又过了晚八点，按規定已关了城門。

我找了家夜茶館，吃了半斤热湯面，躺在椅上唉声叹气。心想妹妹也未必有好光景，干脆甬去了。过去拉洋車的同行如今多半改蹬了三輪。他們劝我去蹬三輪。半夜以后，我看到几个同行，拉了一整天，受尽了屈辱，掙了几个臭錢。他們手提伪法币一大包，說是一两百万，摆滿一桌子，其实也买不了几頓飯吃。我想这买卖还是人干的嗎？我不想在北平蹬三輪了，想来想去，觉得还不如回关外去，深深地懊悔当初沒有听八路軍的話。主意打定了，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前門車站去打票，当时火車还不通关外，只好先到天津去等。

到了天津，也沒有車去东北。呆一天得掙一天吃的，才活得下去。我想暂时到碼頭上当搬运工去，赶到西碼頭一看，真是人山人海，要飯的，逃荒的，扛活的，等車的……乱七八糟地躺了一地，偌大一个碼頭，挤得讓人插不下脚去。偶然間，我又碰見了和我一块从东北来的潘正敏、刘癩子两人，他們問我“北平好找事嗎？”我說“沒轍”。他們說：“天津也是难办，失业的太多了，眼下連个商船也沒有，你就暂时留在天津和咱俩一道去卸救济总署的美国物資，湊够了路費再奔关外吧！”

随后，我們就到围着鉄絲网的軍用碼頭卸貨。白天，我們卸的是美国奶粉、美国面粉。新聞記者的照象机“啪啪”地响，

报上登出大字标题：“感谢盟邦友好援助，美国运来救济面粉。”可是货并不多，抢着搬运的码头工人太多了，一个人一天最多只能扛上五六袋，掙来不够吃的，夜里还得接着干。到了晚上一看，卸完了上面的面粉袋子，船底下尽是长箱子，扛在肩上沉甸甸的，里边装的全是炮弹。

有的人说美国面粉好吃，那是上了美帝国主义的大当，吃完了面粉就得挨炮弹。这些炮弹不会飞到美国去，都是打中国人的。有些书呆子受了他们的骗，还说什么“美国人心好”。去他的吧，咱们的眼睛可看得真，可不愿意为他们卸下炮弹来屠杀中国人民了。

第二天，码头上来了一个穿蓝制服的年轻人，大高个，留分头，他说他叫余英，哈尔滨人，是个大学生。他鼓动我们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抗议，要求不扛炮弹。我们都说好，几十个人一块到大陆银行，找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天津分署的門儿去了。

我们走进大门，有个大胖子坐在靠椅上，对我们爱理不理、洋腔洋调地问：

“嘛事呀，吵吵嚷嚷的？”

“我们要活干！”

“天津有的是活呀！没活就上码头卸救济物资去！”

我说：“救济总署的面粉不够我们卸，炮弹我们又不愿意卸！卸下炮弹来好打中国自己人呀！我们不干这号缺德事。”

他呼啦一下站起来：“你乱嚷什么，你知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是干什么的吗？”

我說：“我們不知道。”

他說：“我告訴你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是美國政府專給中國老百姓干好事的機構，給中國人民運來了大量的救濟物資。你們不是都聽見了，有上等面粉、克寧奶粉……”

我說：“先生，你不明白，白天卸的是面粉、奶粉，可晚上卸的全是炮彈呀！”

他氣得臉紅脖子粗，大聲喝斥道：“你這人怎麼不識好歹，胡說八道！”

我說：“我沒胡說。先生，你要不信，今兒黑夜跟咱們一道瞅瞅去。昨兒晚上，我就糊里糊塗卸了一夜的炮彈……”

周圍的人聽見我們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大，都湊過來聽我們吵嚷些什麼。他急了，生怕秘密泄露了，忙跺著腳直喊：“你還說，你還說！一派胡言亂語！你是幹什麼的？你安的哪心？簡直是一群無賴，快給我滾出去！”他接著一按電鈴，叫來了幾個保安隊，把我們轟了出來。

不卸炮彈沒有飯吃，余英又對我們說：“弟兄們，餓死也是死，干脆和他硬干，吓唬他們一下，大伙抱成團團，把個救濟分署砸了！”於是，我們又呼啦啦一大群跟了去，趕到門前一看，人家早作了防備，不少美蔣士兵托著槍站在門口，根本不能靠近。看來砸是砸不成了，余英又出主意，說：“武的不行來文的，硬的不行來軟的。咱們就坐在救濟分署門前的人行道上‘軟泡’，一個勁要求給分配工作。”

那時天津失業的要多少有多少。我們幾十個人坐在救濟分署門前一坐，要求職業，正對了別人的心思，他們反正沒事，也



跟着来泡上了。不到两天，地上躺着的，坐着的，密密匝匝摆了一大片，馬路上連車都不通了。这一“軟泡”起了作用，反动政府見事不妙，怕事情鬧大了不好收拾，赶紧派了两个官儿，来和我們談話。有个姓高的自称是“第十一战区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連仲的把兄弟，他拍拍胸脯，对我們說：“你們这些无业游民，不就为找个事嗎？都包在我身上。孙长官体念民艰，解民水火，愿意介紹你們去北平門头沟挖煤，你們去不去？”

有句老話說：“家有半碗粥，不上門头沟”。我家連半碗粥也沒有，只要能讓我干活吃飯，上哪儿都去。这样，我們八十多个請愿的人，就在門头沟派来的矿警帶領下，来到了京西門头沟煤矿。

第十一回 寻活路再次下煤窑 埋死者几番争棺材

門头沟本来是个好地方，地下有着无尽的宝藏。帝国主义早就眼红这块宝地，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争先恐后抢夺門头沟煤矿的开采权。抗日战争胜利后，門头沟煤矿的开采权落到了宋子文系統的国民党大官僚手里，煤矿工人受着官僚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双重剥削和压迫，生活苦的簡直没法再忍受了。

門头沟煤矿是竖井，有几百米深，下井要乘罐籠。我們初来碰上的头一个难关就是进罐籠。一个只能容十多个人的罐籠，硬要装进二十几个人，装不进去，把头就用脚踩你的肚子，用凉水往大伙身上浇，大伙冷得身子一缩，他又塞进几个人去，挤得大伙连气也喘不过来。为了多装人下井，給掌柜的多出煤，你挤得多难受他是不管的。童工們更惨，他們年小力单，只能夹在大人的胯下，疼得媽呀娘的直叫唤。有时稍不注意，挤下罐去就得摔死，偶尔伸出条胳膊、腿，一家伙就被折断了。好歹下了井，人已被挤压得腰痠背疼，手脚麻木。一天的重活才打从这儿起始哩！那时候，我們一班十六个人下井，得拿二十四块牌子，干出二十四个人的活来，什么大把头、二把

头，大查头、二查头^①……等等，都是白分錢，不干活的。

头几天，我到了井下三百四十米深的地方，一瞅，人都在污水里滚爬，水没到人的腿肚子以上。我想，这样一天泡到晚，还不把人泡烂？上了工作面，见打眼尽是人力把钎，十八磅重的大铁锤一下又一下的敲，井下光秃黑，眼睛看不真，打偏了说不定就会砸到人家脑袋上。我那时已四十好几了，气力不济，干不了这玩意，就去溜煤。什么叫溜煤？就是把上边放炮崩下来的煤弄到下边，装车运出去。我到了那里，一瞅全是童工，一个个蜡黄脸皮，瘦得象根干柴杆，差不多都光着屁股，少数腰里也只围了条破麻袋片。他们手里全拿着块板子，在长长的溜子板^②上，脑袋朝下，脚蹬上面的煤。推煤下来，人也跟煤往下一块儿出溜。我说：要这么干，人跟煤一块儿掉下去，不就砸得稀烂？孩子们教给了我一个“窍门”，说是把煤推到尽头的时候，两手扶住下面的车帮，身子侧在一边，抬起一些，煤就能从肚子下面滑过去。唉，这哪象人干的活！

一堆煤几百斤重，推到下面又上来，一天到晚推个不停，把人累的筋骨都象散了架。瞧那些小孩子更可怜，一个个有气无力，全累垮了。一天，有个十二三岁的孩子饿昏了头，上井时从罐笼里掉了下去，摔成了一滩“泥”。把头拿个筐进来，把尸体往里一装，提到“万人坑”去扔了就算完事。那年头死

^① 大查头、二查头，指比较小的封建把头，是资本家管制工人的爪牙。

^② 溜子板，是煤矿生产的一种落后的工具，形状和长条的铁板相似，一头连接工作面，另一头按在运煤车的上面。煤爆破下来落在溜子板上，用人力把煤推到煤车里，这就叫“推溜子板”或叫“溜煤”。解放后，已改用鏈板运输机或皮带运输机来代替这种人力推煤。

了个旁人的孩子，就象死只蚂蚁那么平常。

后来我又改干推車和背煤的活。推車还罢了，說起背煤，遭罪可大了。一筐一筐水湿的煤，背在背上把衣服也淋湿了。下山时一弯腰，煤末水一个劲往屁股勾子上淌，整得人又痒又痛，一边走还得一边搔，把个屁股割得尽是小口子、血道道。

人在井下干了一天活，总不能不喝点水吧？可是井下压根就不供应开水，一天拚死拚活的干，常常渴得嗓子眼冒火。渴了咋办？还不是得喝井下的生水。这水甭提多脏多臭了，黑不溜秋的，里面屎、尿、痰、煤渣、烂木头……要什么有什么，喝下去得叫你恶心半天，可是为了压下干渴，也只好将就了。

有首民歌替旧社会的“煤黑子”訴了苦，那詞儿是：

鑛头尖来鑛头圓，
手拍鑛把泪連連。
鑛头問我哭的啥？
黃連味苦在心間。
四壁烏黑难吐气，
滿嘴泥漿血未干。
左爬右跪煤上滾，
血汗齐流在胸前。
背筐拉斗千斤重，
包工把头百般凶。
但盼人間起風雷，
撥开烏云見青天。

我們每天拖着两条沉重的腿爬上井来,劳累了十几个鐘头还掙不到二斤棒子面錢。那年头物价天天涨,有时候你在小飯鋪吃飯,一箇窩头五百块伪法币一个,可你要是掏錢掏慢了點,等拿出錢來說不定已涨到一千块一个了。可恨的是包工柜^①还不大給我們发现錢,經常給的只是一张条子,非得上矿門外天成厚粮店去买粮食不可。天成厚也是把头的买卖,买他一斤扣二两,要不就甭想吃。旁哥們都是干一天掙一天吃的,刚累了十几个鐘头,又得挤在天成厚門口,空着肚子等买粮食。我們越急,掌柜的越是慢慢吞吞,我們要催催他,他张口就罵:“你几輩子沒吃过粮食,臭煤黑子!”誰再頂撞一句,他就要挟上鋪門,咱們吃亏还得忍着气。冬天,寒风象小刀子扎骨头,大伙都站在雪地里,有的披条麻袋,有的身上套个破洋灰紙袋当衣服,有的腰里挂条破得象墩布似的褲子,有的趿拉着一双掉了跟的破鞋,有的光着两只滿是疤痕的脚丫。大伙冻得上牙打下牙,只好不停地跺脚,紧紧地挤靠在一起,稍微挡住些寒气。

等买到了粮食就得赶紧往鍋伙跑。什么叫鍋伙?鍋伙就是工人宿舍。可这是什么样的宿舍啊?两間破土房子住了七八十口人,三面是炕,中間有个爐灶。灶上放口鍋,大伙买回粮食都在这里領了牌子挨号做飯。做碗稀糊糊,加把盐,就算是一頓。

① 包工柜,是封建把头把持的中間剝削組織。煤矿公司的大资本家只和包工柜訂合同,付一定数量的錢給包工柜,由包工柜交一定数量的煤。至于雇多少工人挖煤,付多少工資,全由包工柜自己作主。

在鍋伙里睡覺就更遭罪了。大伙橫七豎八，挤成一堆，这个头压在那个人脚上，那个脚压在这个人肚子上。把头为了讓多睡些人，常常拿根鎬棒往躺着的人堆里一插，大伙一躲閃，閃出条人縫，又塞进个人去。躺着的人有时半夜起来小便，回来就怎么也挤不进去了，只好头靠着腿坐到天明。干活穿一身污黑的窟衣，躺下还是这一身。誰要病了想在鍋伙里歇歇也不行，到时候把头就来撵。第二批人从井下上来要倒換着睡。其实炕上也不过烧得暖一点，既沒条被子，也沒条褥子，鋪的是自个从山上打来的野草，盖的是破烂摊上买来的几条薄薄的破麻袋。要是碰上下雨天，人在鍋伙里可倒霉透了。棚頂四处漏雨，炕上沒个干的地方。有个夏天晚上，半夜下雨，雨点子一个劲往我头上浇，我实在受不了，又困得非常想睡。就扯起块破席子，到又臭又脏的廁所去睡，那儿好歹不漏雨，还有块洋灰地可以凑合。一到廁所里那块稍为干一点的小旮旯，就瞅見地上已有了一个人，硬挺挺地横臥在中間。我推了他几下，想要他給我騰点地方出来，可是他連动都不动一动。我困极了，只好枕着他的一条腿睡，心想他感到麻木了，身子总能动一动吧。我一觉睡到天蒙蒙亮，耳边忽然传来一陣凄惨的哭声：“我苦命的哥呀，你死得好惨呀！……”我猛然惊醒，赶忙翻身起来跑回鍋伙。原来我枕着死人睡了一宿，过后想起来，心儿还咚咚直跳哩！

在矿上，人要是受了点伤，鬧点子病，就更难过了。有天我干活时，不留神把脚踩在柱窝里扭伤了筋，痛得走不了道。伙伴們把我搀到包工柜，要求按照工伤補助三斤小米，歇两

天。柜上先生斜眼一瞟我的腿，摇摇头說：“这不行，不見血不能算工伤，不能給小米。”伙伴們直替我說好話，說內伤就不一定見血，掌柜的臉一板，把手一揮，說：“少罗嗦，我說不行就是不行！明天还下井，不下井甭想吃。你要不干就拉倒，等活干的人多着呢，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看資本家的心多歹毒！

鍋伙里有个姓馬的，害着很厉害的痢疾。有天我們在井下突然听說他死了，几个伙伴一商量，都是階級兄弟，再困难回去也得买张席挖个坑把他埋了。沒想到等我們一早上井来一問，看鍋伙的說昨晚已經把他扔到河滩上去了。我們赶紧跑去一看，老馬的尸体已被野狗糟蹋得不成样子。矿工死了的，还留着一絲气儿的，掌柜的全讓把头往这河滩上扔。河滩上尽是臭肉枯骨，成群的野狗搶死人肉吃，吃得肥头胖耳，油光水滑的，眼睛都紅了，大白天見了活人也汪汪的狂叫，要来撕你的皮肉。

門头沟老話說的“伤病沒人管，死了拉河滩，狗吃人的肉，太阳晒骨头”，指的就是这档子实情。

我还想起个叫沈保齐的青年来。他跟我一块儿从天津到的門头沟。这人原是南开大学的学生，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了，又找不着别的門道，只得跟咱們一块儿卖命。他整天泡在水里，落了个肚子疼的毛病，晚上把肚臍眼紧貼在爐膛上，想暖暖肚子止止疼，前半夜我們还暇見他搭拉个脑袋歪坐着，痛得直哼哼。赶天亮醒来一瞅，只見他脑袋扎在爐膛里，人已烧焦了。

一清早，我就去找包工柜的刘先生。我说：“刘先生，沈保齐死了，咋样发送？”

“死就死，死了扔出去就是，这还用问。”

“怎么扔法，没这么简单，你得给副棺材呀！”

“咋？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他自个死的，生前在柜上也沒个存款，誰给他棺材？柜上管不着！给张破席还得考虑考虑呢！”

我回去和伙伴们一說，余英就气炸了：“给张破席？没这么容易！他家死了人也这么发送嗎？你找矿上安股长去，他要不给棺材，咱们就把尸体扛到办公室，讓他們给送回天津去！”

我又蹚蹚地跑到矿上的办公大楼找安股长去。他明白了我的来意后，脸也没抬，慢条斯理地说：“开矿以来，死的人多了，沒听说给工人出过棺材，何况他还是病死的，又不是砸死的。”

我说：“你知道他是咋样病死的，还不是因为你们井下设备坏落下的病，矿上能不负责嗎？不给棺材也行，咱们就把尸首给你扛来，你们给送到他天津老家去好了。”

这一吓唬果然起了作用，他结结巴巴地改口道：“那——那——那就这样吧，矿上出点木头，叫你们包工柜出钱给打副棺材去。”

我马上请他开了条子，逼着包工柜出了工钱，到木工房找了个天津来的刘木匠给打了副挺厚实的棺材，然后由伙伴们把沈保齐抬到官地上埋了。

第十二回 泄仇恨痛打恶把头 講團結大鬧包工柜

我們五十一号包工柜的工人在門头沟是出了名的。記得我們刚到門头沟不久,余英出了主意,說是为了互相有个照顧,也好抱成团团,讓我們要求把天津来的一批人分在一起,結果才新成立了这五十一号包工柜,叫我們在一个地方干活。那时候,工人們每次到包工柜領开支,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都得在帳房的小窗口外面,在露天里排队等着。有一回,我們这批人气坏了,也不管他許可不許可,一脚踢开了賬房的門,冲到屋里去。那管賬的家伙无法阻挡,却嫌我們“煤黑子”身上脏,不讓我們在他的床上坐。我說:“嫌脏?沒有我們黑爷爷,你小子吃什么?”打那以后,包工柜才改了办法,領开支时不用在賬房的小窗口外面等了。

我們常常鬧包工柜,逼着他們改变了一些不合理的办法,換了几个查头,于是包工柜和国民党門头沟区的党部勾結起来对付我們,請了一个姓隋的主任到鍋伙里来專門對我們这批人“訓話”,还派了矿务队在我們鍋伙外面站崗。“訓話”那一天,那姓隋的神气活現,嘴里不干不淨地說我們是“无业游民”、“亡命徒”。我們都气炸了。这时余英出主意,讓我們提

出賣問：我們是怎么成了“无业游民”的？應該由誰負責？要他答复。那家伙支支吾吾，答不上來，只得夾着尾巴溜走了。

以後他們又變了花樣對付我們，硬把我們這一批人分散了。為沈保齊爭棺材的事情發生後，有特務查出是余英在暗中給工人出主意，專門和資本家鬥爭，就由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下令，強迫余英在六小時內離開門頭溝，往後也不知被他們弄到哪裡去了。我們留下來的工人都怪想念、怪敬重他的。

礦上的把頭、特務，總是欺負我們工人，我心里常常憋着一口怨氣，瞅着個機會就想報復一下。

我們在井下推煤的時候，因為鐵道常被齊腿深的污水淹沒着，我們看不清楚，有時推着推着車就掉了道。掉道的時候，旁邊有根木頭還好，可以拿來當杠子把軸轆扶上軌道。要是碰上啥也沒有，就只好用肩膀或脊背把笨重的煤車頂起來，把軸轆安回小鐵道上去。有一天我的煤車掉了道，碰巧道旁又沒傢伙，我正用脊背哼哧哼哧地把車軸轆移近鐵軌，總管郭老四悄悄走來，操起鎬棒就朝我腿上打；我越着急，他越打；他一邊打，還一邊罵。我一下子火了，轉身一拳打在他的胸膛上，把他猛力一推，他就倒在水溝里。

他跌倒在污水里直嚷嚷：“你，你，你敢犯上，打起總管來？你，你，你要造反了？！”

“我不管你總管不總管，車掉道了，老子脊背骨都快頂斷了，你不幫忙，倒來瞎嚷嚷，拿棒子打人，我不把你掀開不礙事嗎？”

在井下的弟兄們都拍手稱快：“打得好！打得好！”郭老四



瞅瞅咱們人多勢眾，怕再挨揍，趕緊夾起尾巴罵罵咧咧地跑了。井下誰都是抹得一臉黑，他認不清我是誰，也找不到我算賬。

一九四七年旧历年三十，我們照常下井，想按慣例掙個雙份工錢，第二天好過個新年呀！在井下干了一宿，年初一早晨上來，渾身水淋淋的，被井口的寒風一吹，衣服都結成了冰，凍得人直打顫。我們用雙手把衣服裹得緊緊的，縮着身子趕緊跑回鍋伙，隨手抓根棍子敲掉身上的冰凌。我喝了碗熱水，暖了暖心窩，立刻去找包工柜，想領出點錢來買下糧菜好過年。一路上，但見礦門外的河南街上盡是那些國民黨的官兒、資本家和把頭們，一個個吃得肥頭胖耳，滿嘴流油，帶着他們的大太太、二太太，走東家，串西家，互相打躬作揖，恭喜發財。他們的少爺小姐們，還冲着咱勞煤黑子摔鞭炮，耀武揚威哩。從他們的家里不時傳來猜拳行令、打麻將、推牌九的喧囂聲。想起我還腹內空空，腰無半文，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恨從眼前生，腳底象抹了油似的，一溜小跑，就冲到包工柜門上。

我找到掌柜劉炳恆，氣呼呼地說：

“掌柜的，過年好呀！勞駕您給開份工錢，也好讓我過個窮年！”

他指指牆上貼的火紅紙條說：“你怎麼大年初一來要錢呀？沒長眼睛咋的？牆上寫得明明白白：‘歡慶新春佳節，初六開市大吉’，眼下銀柜都封了，你們的錢等正月初六再算吧。”

我一聽就氣炸了，指着劉炳恆的鼻子問：

“掌柜的，你还有点儿良心吗？咱们大年三十晚上下井，四块石头夹块肉，也不知道第二天还上得来上不来。好不容易上得井来，还领不上一份工钱？你倒好，安闲自在，不劳不累，睡一夜起来，鸡鸭鱼肉，白干饺子，样样都全，这都是穷哥们用血汗给你们挣出来的，你们真是吃人肉，喝人血，连骨头都不吐一吐呀！”

我一看他家煮饺子的大锅正冒着热气，就抢上前一步，掀开锅盖，端起锅来就要往外倒，“你要我过不了年，我也让你过不好年，你别以为‘煤黑子’是那么好欺负的。”

他慌了，生怕我搅得他过不好年，赶紧堵住门，把我扶到条凳上：“老白，大年初一的，干嘛生这么大气呀！有话好说嘛。这样吧，我身上现钱也不多，先从我这儿拿去十万块钱，到河南街上喝碗酒，吃碗肉，买盒烟抽吧！”

我回去以后，锅伙里的弟兄们知道了这事情，他们都气得一个个拳头捏出了水来，一齐跑去围攻包工柜，才每人发了一笔钱，好歹算是过了个穷年。

一过年不久，形势变化很快，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物价一天涨几遍，万元大钞当手纸用。蒋匪帮的警车成天呜呜叫，在学校和工矿到处捕杀革命青年。门头沟矿的工人也被他们看管得更紧了。矿里头设了个警察所，矿警们这儿那儿巡视，看谁不顺眼就抓去押起来，说你“串通八路”，又是吊打，又是压杠子，逼得你掏出血汗钱来供他吃喝才罢休。临到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又出来个所谓“人民服务队”，都是国民党二〇八师的一些兵痞子，成天吆喝“搜查共产

党”，到住戶家翻箱倒柜，在街上拦路搜身，瞧見什么值錢拿走什么。有天我走进西大門去上班，正碰着一群“服务队”在搜身，他們也拦住了我，枪上的刺刀直碰着我的肚子，我随手一擦擦开，說：“这是干嗎呀？”好，这就成了“越軌行动”，把我抓到“服务队”队部去，不給吃也不給喝，圈了两天。

这时候，石家庄、井陘、阳泉都已經解放，从那边逃来很多地主、資本家，有的在門头沟开小窑，有的混到矿上做职员，他們净造謠說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我在鍋伙里給大伙說，我从二十多年前拉洋車那会儿起，一直听反动派造这些謠言，可眼見的就只有帝国主义、軍閥、国民党残害老百姓；反动派也年年喊“杀共产党”，可是現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軍已經离北平不远了，穷人都拥护共产党。我还說在东北見过的八路軍多么和气，他們就是如今的解放軍。大伙一听，也来劲了，都說：“瞧那些地主老財們，一听说八路軍来了，成天心惊肉跳，东逃西躲的。黑夜总有个尽头，看起来咱穷哥們翻身的日子是快到了！”

第十三回 庆解放翻身作主人 干革命永世不忘本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拨开乌云见青天，门头沟欢天喜地，迎接了解放。我从一个“臭煤黑子”变成了光荣的煤矿工人。矿上来了解放军的干部，他们专爱找老工人聊家常，谈革命，我也爱找他们，彼此谈得挺合心。我告诉他们矿上的包工柜、把头怎么祸害人，要求把他们也“革”了；解放军同志都说我讲得对，还说共产党就是反对压迫、反对剥削。我顿时觉得这些同志都象我的亲人，我跟着他们干，除了努力搞好生产以外，还积极参加了他们领导的各项政治活动，反把头、防特务、搞宣传……。我参加了解放初期的“工人护矿队”，白天黑夜轮流值班，拿着根长棍子，到处巡逻，保护煤矿财产，防止特务破坏。我还参加了演剧团，演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活报剧，在解放军举行解放北平入城式时，我们推着一辆小車，进城去演了两天，在街上又唱又跳。那时，我已经是快五十岁的人了，可不知怎的，一下子变得特别年轻，从早到晚的忙，不觉着一点累。我看到解放初期京西矿务局高局长光脚丫子和咱们一道下井苦干，没有一点官架子了；瞅见人民政府接受工人群众的要求，枪毙了无恶不作的大把头张振凯，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我

深深感到如今的党和政府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完全是咱人民自己的政府，是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的党，因而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完成生产和其他各项任务。

解放以后，喜事多得象夏天晚上的星星。我曾出席过在唐山举行的工矿代表会议，又到北京市总工会举办的一个工人训练班去学习过。领导上派我去参加学习时，我说：“我斗大的字不认得一石，还能学？”领导上说：“这训练班就专门招你这样的老工人。”我去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上学。记得小时候家里要我到前门外德老先生的学堂念书，德老先生看我一身破烂，“出身下贱”，说我“不配念书”，把我从学堂里赶出来；想不到如今活了五十岁，共产党还派我去学习，学习期间照样给工资。前后一对比，我心里着实很感动。我们在训练班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学习了恩格斯的《从猿到人》，还听了彭真、刘澜涛等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无论听课听报告，我都专心专意，把每个字每句话牢牢记在心里。

我们班上还开展了诉苦活动。我因为不会写发言提纲，原先没准备上去讲。可是听别人一个接一个诉苦，自己几十年来经受的事情也在心里不住翻腾。多少仇恨，多少屈辱，象一把火在心里烧着。我茶饭无心，白天黑夜地想，越想恨越深，越想越坐不住，一蹬脚上了台，把我几十年来在旧社会受的种种苦难和压迫，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末了我喊：“我要报仇！”我相信共产党能替我作主。后来，经过训练班的同志耐心教育，我才慢慢明白过来，原来旧社会的苦难都是阶级压迫的结果，那些解放前骑在我脖子上的帝国主义者、老板、债主、

軍閥、汉奸、特务，都是剝削階級的人和他們的走狗，那些警察、大兵就是這些人支使的。我懂得了，自己受的這些苦、這些壓迫不是我一個人的仇，這是階級的仇。只有象今天在共產黨領導下徹底打倒了反動派，改變了社會制度，我們勞動人民才能真正翻身，才能當家作主。

我在訓練班訴苦以後，有一天領導上要我到革大^①去作報告，把我在訴苦會上說的事情對革大的學員們講一講。那天有件事我永遠也忘不了。原來在台下聽我講的許多人里面，有一位是解放前國民黨政府的北平市長，他就坐在第一排。提起這位市長，我想起了解放前他有一次到門頭溝煤礦去“視察”，礦上宣布戒嚴，不許工人隨便走動。我們正從井下坐着罐籠上來，剛好趕上戒嚴，罐籠就在半道停住，上不能上，下不能下，一直等到這位市長離開門頭溝，我們才到了井上。那時候我們工人沒有絲毫權利，沒有任何地位，只有受氣的份兒。現在，我在台上講苦情，他在台下受教育，我不知道這位曾經為反動派服務的“市長”，此刻作何感想。

經過訓練班幾個月的學習，我覺得心明眼亮，有了奔頭，回到礦上工作也渾身是勁。不久我就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我走南闖北一輩子，好容易才象孤兒尋到了親娘，找到了咱工人階級自個的黨。一九五四年，我被選為北京市人民代表，出席了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會上，我萬分榮幸地和各族人民熱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握了手，還一起照了相。

^① 革大，指解放初期的華北人民革命大學。



那时候，我心中翻騰着千言万語，但是激动得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一个“煤黑子”和国家领导人見面握手，这种事情哪个朝代有过？我心里說：毛主席啊！要沒有您，我怎么能今天？旧社会里，我跑遍了天南海北，梦想找到块能够安身立命，吃飽穿暖的地方，但是天下老鴉一般黑，穷人到处沒有活路，只要是两个肩膀扛个脑袋的，日子全不好过。几十年来，我风里雨里，血里泪里，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压迫和剝削，一直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只有共产党解放軍来了，打倒反动派，劳动人民掌了权，受苦受难的穷哥們才翻身作主，見了青天。毛主席领导咱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家，这国家是无数革命烈士的鮮血换来的，我們也要用血汗来保卫、来建設才对呀！

我常常跟年輕人念叨旧社会的苦处，要他們永不忘本。有的青年要我把現在的生活跟解放前作个具体比較，我說，这实在沒法比。我在一九六一年滿六十岁时就退休了，不干活每个月还拿工資百分之七十的养老金。組織上又特別照顧我的生活和我的健康，一切全不用自个操心劳累，我的晚年生活多好啊！要是在解放前，年老干不了活的人，不知早被扔到哪个山洼洼里喂野狗了。

更叫人高兴的是，看到咱們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越来越兴旺，人民的生活一天天的好了起来。就拿我們京西煤矿來說吧，差不多每年都有新的现代化的矿井投入生产，井下一律改用风錘、电鑽、割煤机，还使上了康拜因。挖煤不再象过去那样靠笨重的手工劳动了。溜煤有了电溜子，也早已不用人推

了。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开着电車輕輕快快就把煤运了出来。如今京西一年出的煤比解放前十年出的还多。矿上給工人們盖起了热水浴室、日光浴室、宿舍大楼、俱乐部；盖起了医院、疗养院，工人有病的都能享受免費治疗，劳动特別好的，夏天还能上北戴河休养。每天下班以后，一群群矿工坐着电車出井，洗过澡，换上衣服，一个个容光焕发，穿得整整齐齐，有說有笑的走出来，誰也瞅不出他們脸上还有一点煤灰。对这些事情，有的青年感觉是天天如此，平常得很，好象日子从来就是这么过似的。对比今昔，忆苦思甜，我却常常要激动得掉下泪来。我禁不住要想起有病沒錢治、烧死在爐膛里的大学生沈保齐，想起被日本鬼子和汉奸逼得上吊死去的劳工康万有，还有那成千上万的华工死得多惨！那时候他們怎么想得到，我們今天会有这般幸福的生活。我常想，要是他們也能活在今天这样美好的日子里，会感到多大的幸运啊！因此，我虽然退休了，我还是一心惦记着矿上的事。我常常到各矿走动，有什么意見也直率地提出来。只要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設有利的事，我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坚持革命到底。我有点心脏病，領導上照顧得无微不至，心里很过意不去。可我对年輕人作报告，一說好几个鐘头，心倒不蹦不跳；躺在家里反而覺得很不踏实。老一輩的劳动人民在解放前受了千般苦，如今的年輕人都不了解，多跟他們念叨念叨，他們才会知道旧社会的黑黯，才会更热爱現在的生活。

現在的生活根本不能跟解放前比，要比只能說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十来岁就靠自己卖气力活命，“老太爷”的拐

棍，掌柜的油烫火烙，反动警察的追打辱罵，帝国主义的靴子皮鞭……，哪一样沒有領教过，至今从头到脚还落下滿身伤痕，每到刮风下雨，阴湿天气，就痛得要命。逢到这种时候我不由得更加痛恨起旧社会，痛恨起階級敌人来。如今这么大的孩子，不是在学校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么？他們在幸福中长大，不仅自己的父母，而且托儿所的阿姨、学校的老师、馬路上的民警、医院的大夫、护士……所有的人都对孩子們关怀爱护，把他們当花儿朵儿来培养，生怕他們摔着、碰着、餓着、冻着。小学毕业了，还能升初中，有的还能升高中、大学。不能升学的国家就給安排各种劳动就业的光荣崗位。这些都是解放前的穷孩子們連做梦也想不到的啊！我們千万不能忘記今天的幸福是从哪里来的！

好了伤疤不能忘了疼，自个翻了身可不能忘了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受苦受难的階級弟兄。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祖国建設得越来越强大，帝国主义才不敢再来欺侮我們，我們也才有更大的力量去支援被压迫民族。眼下，帝国主义还在妄图侵略我們，現代修正主义也在百般誣蔑我們，国内还有那么一小撮不甘心死亡的反动分子日夜都在梦想变天复辟。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辛勤劳动，不上一切牛鬼蛇神的当，把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搞得好上加好，尽最大力量来积极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